

金學成主編

日本研究叢書之五

亡命十六年

野坂參三著

金學成譯

『民主的共同戰綫是世界的潮流，歷史的潮流。祇有我們日本從這世界的、歷史的潮流除外，這是不應有的事。如果想從這個潮流把日本除外，這事會導日本於滅亡。』

野坂參三

## 譯序

日共領袖野坂參三的「亡命十六年」，正和同是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志賀義雄合著的「獄中十八年」一樣，是在日本最爲人民大眾所愛讀的自敘傳。譯者把牠譯出，在遠東唯一大都市上海被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今天獻呈給全國人民大眾，倒並不單純地祇爲了牠是戰後日本銷行最廣的一本名著，和牠的內容是日本人民領袖以自己熱情的筆寫下的活生生的鬪爭史。主要還有着下面的原因在驅使我，鼓動着我，排除萬難，譯完於通緝追捕的驚恐顛沛之中。

中國人民在抗戰八年中受盡了日本瘋狂的軍事法西斯主義者的迫害，所以在每個中國人民的心裏無不希望已因戰敗而倒下的在手上沾染着中國人民的血跡的日本反動派永遠不會再爬起，也無不祈求這批泯滅了理性的殺人魔的衣鉢繼承者永遠不再在日本出現。可是中國人民的這種由衷的一致期待，怎樣才能實現？毛主席在日本還未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卽已在「論聯合政府」中正確地指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爲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軍閥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這種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閥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比這略前，野坂在初到延安

時，也曾對往訪的解放日報記者強調着中日兩大民族的民主勢力的緊緊攜手，說：「由現在世界情勢和地理關係說，中日兩國共產黨今後應本互助精神，加強合作，更積極地展開東方民族的人民戰綫運動」。我們被中日兩國的人民領袖完全一致的上述論斷所提醒了的一點是，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才是太平洋和平的保證，另一點是，這種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中日兩國共產黨的互助合作。

現在，在日共領導下的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和反動勢力的堅苦鬭爭中一天比一天接近人民民主的燈塔，特別是今年一月的普選，日共所獲得的衆院議席由四名一躍而爲三十五名，所獲得的選票由一百萬票一躍而爲三百萬票，使議會中的反動黨派相顧失色，這事不但明白表示日本民主勢力已建立了向民主制度之樹立跨了巨步的豐偉的里程碑，同時也是最近僅亞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的歷史性的事件。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獲得這樣的輝煌戰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獲決定性勝利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換言之，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勝利幫助了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的成就，是很明顯的。但是，另外的重要原因，則爲了日共所領導的鬭爭路綫的正確，也是鐵般的事實。原來直到日本投降爲止，日共一徑主張暴力革命以達成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向來被天皇制思想癡痺了的日本一般人民所望而却步，可是野坂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祖國以後，他即積極進行人民戰綫運動，主張在這戰綫中不但應有工農及小資產階級參加，還應讓一部分產業資本家即民族資本家參

加；那就是要在日本實行新民主主義。並且他還提出了一個新口號作爲黨的努力目標，即「可愛的共產黨」，務必使日本一般人民對共產黨的觀感，以「可愛」代替過去的「可畏」。野坂所倡的這一正確的領導方針，現在果然獲致了效果，他已成了日本人民感激與信賴的視綫所集中的偉人。

但是野坂的成就決不是偶然的，毋寧是他所具的時代背景和他的經歷以及他的英明的認識，才是決定他今日成就的因素。他生於軍封帝國主義的日本，熟知日帝發展的內在矛盾；他到過美國，研究過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國家的缺陷；他到過英法德諸國，對爛熟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具有深切的了解；他到過蘇聯，第一次在大革命後不久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代，第二次在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時代，使他體驗着蘇聯所由成功的曲折的道路；最後他在中日戰爭期內在延安住了多年，經常和中共的領袖們在一起，也目覩着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日益壯大，使他深深體驗着半殖民地國家走向獨立解放，民主進步的成功途徑。這些，都是野坂比了其他過着多年獄中生活的日共領袖們在把握黨的正確的指導方針上處於更有利地位的原因。

中國人民解放全中國將是一九四九年內的事，這即使在不斷爲國民黨反動派輸血的美帝也不會有勇氣否定吧。等到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完全獲得解放的一天，全世界人口就有二分之一站在共產主義的大纛之下，國際帝國主義企圖抹消光明的陰謀將更明顯地會成爲徒然；

但是國際帝國主義爲了作臨死的掙扎，必定不會忘記使出所有一切更卑劣更殘酷的方法。特別是在日本美帝已和日本獨佔資本的代言人，賣國的買辦反動政府勾結，以日本人民的血汗和生命作爲賭本，進行反蘇反共的大陰謀。我們爲了阻扼美帝卵翼下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捲土重來，爲了保證太平洋乃至全世界恆久和平，對這種陰謀應有最高度的警覺；正唯如此，中國人民應以最大的力量來「幫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我們尤應盡可能支持正確領導着日本革命的日共領袖，也是中國人民親切的友人，通過他們給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以最大的支援。

在本書中，即將展開這個親切的國際友人的真實而生動的故事。

一九四九·五·二五·大上海解放之日。

# 亡命十六年

## 目次

### 亡命以前

- 一 出身……………一
  - 二 加入友愛會……………二
  - 三 在倫敦入黨……………三
  - 四 在「市谷」迎接大震災……………五
  - 五 再度入獄……………八
  - 六 老鼠和特務……………九
  - 七 逃出故國走上亡命之旅……………一一
- 蘇聯的印象
- 一 作爲岡野進的生活……………一三
  - 二 偉大的片山潛……………一六
  - 三 片山潛的國葬……………一九

四	被重視的蘇聯兒童	二一
五	學校種種	二三
六	豐富的私有財產、優裕的生活	二六
七	打扮的莫斯科姑娘	二八
八	無賊之國蘇聯	二九
九	休養所生活	三〇
一〇	完全的民族平等	三三
一一	指導者的印象	三五
	(A) 史達林	三六
	(B) 狄米托洛夫	三八

## 延安生活

一	從蘇聯到延安	四〇
二	研究祖國是第一項工作	四二
三	日俘的教育	四四
四	對日軍的政治活動	四七



五	優厚的八路軍對俘虜待遇	五〇
六	延安這地方	五二
七	邊區的政治	五六
八	第三國際的解散	五八
九	毛澤東的印象	六〇
一〇	朱德的印象	六五
一一	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	六七

### 走向國難的祖國

一	太平洋戰爭與反戰鬭爭	六九
二	亡命告終	七一

# 一 亡命以前

## 一 出身

我在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三月，在山口縣的萩町生下，爲商人兄妹六人中最幼的孩子。萩町，有如大家所熟知，是吉田松蔭的出身地，是在松蔭的明倫館受了教育的青年活躍於明治維新，而成爲藩閥政府的母胎的地方；可是同時，也是前原一誠掀起騷動的地方，明治維新的革命傳統在當時也還殘存着。

我家雖是小商人，但在我幼年時破產了。從此，我的兒童時代完全在赤貧中過着。年長的哥哥和姊姊們遠離鄉里去工作，靠他們工作着寄來的錢，勉強維持着一家。在這樣貧窮的兒童時代，受着因爲當地是田中義一大將出身地之故的軍國主義影響，希望成爲軍人，一時也曾決定要進陸軍幼年學校。但是在小學生時代，家人却說因爲家裏窮，還是做個商人吧。

十四歲時，父母都死去了。結果，就只得到神戶經營木材商的長兄那裏，由他撫養了。在神戶，雖進了商業學校，但從畢業以前起即已接近着社會主義思想。這事的動機、一點是因爲家庭生活的貧困；再一點，則因爲在畢業前不久即明治四十三年（一

九一〇年）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事件，是受了這事件的影響。這個歷史的事件，我的心裏植下了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興趣。關於幸德事件我所得的印象是，他是為社會主義而戰鬥的一個英雄。明顯地開始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則是在美國的陳舊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伊里的書中偶然發見了有論述社會主義的一章，而把牠緊緊抓住着讀了之後。這書，是當時出版的很馬虎的東西，在現在看來是可笑的書，但總之牠曾給我刺激。畢業時照例要寫畢業論文，我就寫了一篇「論社會主義」的短短的論文。可是先生看了非常憤慨，當着全級學生的面，嚴厲地責罵我，說這是學校的不名譽。但是我並不覺得什麼可恥。

在這個商業學校畢了業，十九歲時到東京，進了慶應大學的理財科。

## 二 加入友愛會

我的思想大踏步地社會主義化了。即使在學校裏，對功課方面也不大用功，却歡喜跑舊書店，貪婪地讀着國內外出版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書。而且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加入了最近才死去的鈴木文治所主持的友愛會——即以後的勞動總同盟。

從這時起，我踏進了社會運動的實際活動。雖還是學生，却已擔任了教育勞動者的工作，和神戶的川崎造船所的勞動者以及東京的金屬勞動者，親密地交往着。在那些勞

動者中，有以後在關東大震災時以龜戶事件而被殺的平澤計七等人。其後也是每逢有機會，去參加勞動者的集會。在學校讀書時代，我的朋友幾乎沒有一個是學生。母事在勞動者中有我的朋友。那時，在思想方面，受着爲當時日本革命的勞動者所支持的 Socialism（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的勞動組合主義）的影響。因此我的工作也傾向於勞動組合的革命化這一方。

在慶應大學一畢業，依照代替了父親的地位的神戶的長兄等的意思，是要我馬上做公司職員，可是我不聽，却決意專心致力於友愛會的工作。我担任友愛會的書記，幹着機關紙的編輯和教育等工作。月俸是四十圓；但這也只幾個月便告終，以後靠翻譯等工作來過活。

在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生了。我受着極大的影響，以後我的思想即走向共產主義的方面。

### 三 在倫敦入黨

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歐洲大戰剛終熄時，我以友愛會特派員的形式到英國。費用是由神戶的長兄負擔的。在英國，調查和研究該國的勞動運動，同時，也參加英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翌年即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產生時，我立即入黨。在第一屆黨

大會中，我作為倫敦支部的代表出席，其後，在共產黨的各種集會中演說。因此，被 Scotland yard（即倫敦的警察廳）所嫉視，接到了在三日內必須出境的命令。於是離開英國到法國，再從瑞士到德國，在這個期間，一直被 Scotland yard 追蹤監視着。在法國，在巴黎住了一個月光景，那時一點也不知道，可是離開那裏到了瑞士，就有法國友人來信，說在我動身的翌日，就有法國的官憲跑來過。到了柏林，暫時沒有什麼，可是過了兩個月，突然有便服的怪男子走到旅邸來，喚着我的名字，調查我的行動了。這人帶來了搜查用的照片給我看，可是實際上，那是和我面貌相似的英國人的照片。我抗議着這照片不是我時，他露着半信半疑的奇妙的神情回去了。在德國，調查着德國的勞動運動，可是不久，因為這項工作已告了一個段落，所以離開那裏到俄國去了。在俄國住了一個月光景。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因為革命後還沒有多久，所以當時還很荒涼，從俄國回到歐洲，從馬賽乘船，走上了歸國之途。在蘇彝士、哥倫布、新嘉坡、香港等許多靠岸的港口，必須獲得許可才能登陸，但我因為有 Scotland yard 在作祟，所以英國官憲並不給我許可。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回到了日本，還是在從友愛會改了名的日本勞動總同盟中，協助着機關紙「勞動」的工作，翌年秋，被母校慶應聘為臨時講師，我接受了。以「世界的社會問題」這題目，講授了三個月。在學生中有野呂榮太郎和秋笹正之輔；並

且慶應在這時才產生了社會科學研究會。

#### 四 在一市谷「迎接大震災

在這一年即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黨以堺利彥和山川均為中心而成立了，我被勞動總同盟內的共產主義者牽引着，立即加入了這個黨。翌年三月，在東京郊外石神井的茶館，偽稱肥料公司的總會，而開了非法的黨大會，但是却因此而被警察偵知了黨的存在，和其他的黨員一起，我也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遭了逮捕，到十二月為止一直在獄中。

在那個期間內，發生了那次關東大震災。在市谷的獄中遭遇的震災的經驗，真令人不能忘懷的。

震災的那天，恰巧在剛吃完午飯之後，搖搖幌幌地震動起來了。起先還什麼都不知道。後來在天花板上吊下的電燈，開始劇烈地轉圈子了。這才「不得了！」知道是地震。感到這不是普通的地震，奔到窗前一一看，我的監房前面的廚房的高煙囪，看着牠倒下了。廚房已全部潰裂。我也覺悟着，認為已糟糕了。這時，禁卒突然從外面給我開了門。這事如果依照獄規，是不行的。因為必須有了所長的命令才能放出犯人的，可是這禁卒却並未得到命令就擅自把我們放出了。究竟為什麼放出，固不知道，不過我們這些

人大概都是共產主義者，也許是爲了同情我們，否則爲了本來具有正義感吧？——不過不管怎樣，總之立即把我放出了。走到屋外一看，則放了出來的全是我們這些共產主義者的集團，從外面望裏看監房時，犯人的大半還留在裏面。他們拉着窗上的鐵格子發出悲痛的聲音『請放出吧！請放出吧！』可是並不去放。震動了一會，雖然有瓦掉下來，但房子則也許因爲木造的緣故，却沒有倒塌。地震大體平靜下來之後，才把其他的犯人也放出了。全體集合到了院子中央。其中有小偷，也有殺人犯，可是大家非常歡喜。有將近一千個人擠在廣場中。我們的力量強大起來了。大概是所長立即把這事報告了軍隊吧？——不久在監獄的圍牆外，就已有軍隊來包圍着了。到了傍晚，軍隊鎗上插了刺刀走進院子，對我採取了包圍的姿勢。

翌日，犯人們取得了聯絡，以每個獄舍一人的比例，推出代表，組成代表委員會，向所長提出了全體釋放的要求。所長說絕對不放。他說，依照獄規，如果獄舍起了火，不妨釋放，可是現在房子也還沒有倒塌啊！代表把這話報告了全體。於是在犯人中間——我們雖沒有參加——開始進行陰謀了。在他們中起了這樣的議論：既說獄舍起了火可以出獄，那末索性放一把火吧。有少數人，祕密地決定了這個部署。預備把燒飯的火拿來投入監房內，掀起火災，並且已開始作這項準備工作了。但是這事被監獄方面的間諜聽到，把陰謀暴露，自此以後，我們的身邊就變得非常嚴重了。鎗上插了刺刀的軍

隊，不斷地在我們週圍巡迴了。這樣，釋放的要求既已無望，於是犯人代表委員會提出了新的要求。這要求是：把我們的代表者數名釋出，叫他們視察東京，什麼地方遭火災，以及燒毀的程度，他們看了後來報告全體知道。但是這要求也遭了拒絕。於是，代表者就把這個交涉的經過向衆人演說。其中有一個人極會說話，作了非常高明的演說，使全體興奮，並且大加煽動。也有流下眼淚嗚咽着的。這時所長跑來，命令停止，犯人們就激憤着對抗，開始投石子，可是忽然發覺在我們背後大約有一小隊的兵，已在舉鎗作射擊的準備。我們驚駭了。盡量想走得距離鎗口遠些，拚命地逃跑了。

從此以後，監獄方面便借了軍隊的力量來反擊，我們被釘上了手鐐，完全失去了自由。但是被認爲最下等的人的監獄中的囚犯，却能組織堅持他們主張的代表委員會，這是很有趣的。

震災發生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被關入了還在搖動的房子裏，可是我，則與堺利彥爲鄰，都被迫睡在走廊裏。

後來才聽人說，殺死大杉榮的甘粕大尉們的那個憲兵隊，這時會走到監獄來要求交出我們這批共產主義者，但是所長說監獄屬於我的管轄，不屬憲兵管轄，所以不能引渡，而加以拒絕了。憲兵們好像每逢有機會就要把我們殺死似的。實際上，我們也因為在監獄裏才平安無事的。當時如果在外面，也許已遭了毒手也未可知。在江東方面，有



龜戶事件發生，友人平澤計七等人被捕，被憲兵所殺。平澤雖是純粹的勞動者，却也能寫小說之類，真是可憐的人。

## 五 再度入獄

震災告終後，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保釋出獄了。一出來，就再入勞動總同盟，繼續幹有關組合的工作，同時也屢次舉行黨的再建起見的祕密集會。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總同盟的調查部發展了起來，產業勞動調查所已作為獨立的機關產生了，我被推為所長，發刊了「產業勞動時報」和「國際」這二種雜誌。這個調查所，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研究日本及世界的政治、經濟、勞動問題等，並且靠着出版物而對於學生和勞動者的思想上，給了很大的影響。

在翌年即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總同盟分裂為左翼和右翼了。並且左翼被開除後組成了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於是我擔任了這個評議會的思想的指導。自此以後，雖曾參加勞動農民黨的創立，日本共產黨的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的編輯，不過在那時，因為有二年前的第一次共產黨事件的判決，結果在監獄中受了八個月的徒刑。這樣一直，從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到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為止，我專心從事於黨的工作，可是在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遭了所謂三、一五的一齊檢舉，我在睡着的時

候遭了逮捕。

當時我借居在武藏小山的一個土房，而住在這週圍的評議會的人們也大多被捕了。妻也這時一起被捕，後來在我保釋出獄略爲早一些時被釋出。

進了監獄經過了一年半光景，我的身體大大地壞起來了。尤其是眼睛最壞，終於明白知道這是需要手術了。憑監獄裏的醫生，是什麼也不懂的。因此，我從以前曾爲我醫治目疾的醫生，獲得了證明書，證明這是惡質的翼狀贅片的目疾，無論如何必須用手術；此外，又獲得了律師的證明，以必須在外面施行手術爲理由，向監獄當局進行了長期間的交涉，結果，終於獲得了檢察署的許可，准予出獄一月施行手術。

## 六 老鼠和特務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三月走出監獄，可是因爲附有這樣的出境命令，說不准在東京之故，就到兄長及家庭所在的神戶去看眼科醫生。可是正在醫治眼睛的時候，却接二連三地又來了各種病。由肺炎而成爲腹膜炎，又成爲痔病，痔病的手術行了二次，最後則生了糖尿病這一種慳慳的病症。因此，輾轉各個病院，每逢轉一次，必須獲得醫生的證明和初審法官的許可。最初是獲得了一個月的許可，等到期間一滿，就又耍了證明，一個月，二個月地獲得許可，結果，在外面已住到了一年了。出獄後不久，就取得

了和黨的聯絡。有過黨的中央委員跑來在病院裏討論種種問題的事。也有過從外面回來正想睡下時發見在病房的臥床中留下黨的祕密機關報「赤旗」的事。在身體比較好的時候，則在神戶的墓地上和黨的使者聯絡。再說，在我出獄後不久，黨便作成了派我到蘇聯去的計劃。但是因為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好，而且剛纔出獄，對日本的狀態也完全不明瞭，覺得與其立即去，不如略為過幾時再去的好，所以決定延期了。

但是那年秋天，黨又決定派我到蘇聯去參加第三國際了。那時因為身體已好，我就接受這個決定，開始作逃走的準備了。作為準備，首先必須使正在監視着我的特務警察不要每天都來。因為如果每天都來，對於服裝，攜帶品以及其他的準備上都不方便；而且一逃走馬上會知道，將在中途被截。於是開始這樣的計劃了，即使特務每隔兩天一來，三天一來，四天一來。我覺得必須使他四、五天不來，並且就着手這個計劃了。這個計劃是從獄中所讀外國書裏所載馴鼠經驗談獲得了暗示的。那是這樣的一段故事：老鼠走到門口，最初則把麵包屑放在門邊，牠吃了回去了。以後則把這個放置麵包屑的地點，一點一點移近自己這面來。這樣過了幾個月，結果，牠會走到人身邊泰然吃了。我想用這個方法，把警察的來訪，從每隔一天變為每隔兩天，這樣地延長下去。因此，決定對特務警察採取非常正直的態度，毋寧要從自己這方面向他詳細報告每天的行動。打電話給他，說因為要到什麼地方去，請他一道去吧，對方說一道去好了，就跑了來。於

是完全照電話中報告了的那麼行動。對方就漸漸地對我相信起來了。照着這樣的情形，本來每天都來的特務警察，到了十一月裏就每隔一天、兩天，三天這樣地來了。我那時覺得，我們對人民固絕對不能欺騙，但是對革命運動的敵人，在必要時，不妨欺騙一下。

於是慢慢把揀着特務不來的日子，開始作準備了。要逃出日本，決定扮作普通的商人去旅行，並且打算扮作與哥哥的事業有關的木材商人出走，印的名片上也註上職業和住址。樣品也已從哥哥家裏秘密取了來。打扮得誰看了都相信是商人的模樣。

## 七 逃出故國走上亡命之旅

準備工作終於告成，於是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的某日，從神戶出發，踏上了十六年亡命的第一步。

對神戶的哥哥家裏，則說因為身體也已健康，並且不能不回到監獄去了，所以要先到箱根的溫泉去靜養一下，然後再去東京。並且對他們說，即使警察方面來，也請這樣說。並且在出發之前，和黨聯絡着預先作成了證明，說我在箱根靜養着。或則從中途在火車中寄信，或則從箱根發信，種種的部署都已做好。這次我回來一問，知道特務在我出發的翌日好像跑來過。這比了我的預想為早，大概他那時是半信半疑吧。因為從箱根

來了信，他大體上好像已放心，可是過了幾天仍沒有知道到了箱根的什麼地方。這纔知道是逃走了，可是那時我越過滿洲的「國」境，進入蘇聯領域了。

路程也是黨的方面給我準備的。從神戶的三宮車站，和妻一起扮了木材商人夫婦搭了上夜火車，直開門司。從門司坐船往大連。從大連再往前去，則把名字也改了，名片也改了，變成了大連人。然後向北滿出發。通過哈爾濱走向滿洲東部「國」境，可是在最初停下的波克拉尼迭那亞車站上，遇到中國的稅關的檢查。担任國境警備的警察，好像對我們覺得有點奇怪，問我們到那裏去。我出示名片，並且說我的辦事處也在滿洲。他說那末你下一班火車就回來，我答應一聲「是」，勉強通過了。後來聽人說，因為我們沒有在下一班火車回來，曾經跑出來搜查的。從那裏徒步越過了海參威西北附近的蘇聯國境。這是從神戶出發後的第五天。走入了蘇聯領域，從海參威由西伯里亞鐵道往莫斯科去了。

## 二 蘇聯的印象

### 一 作為岡野進的生活

我到莫斯科，這是第二次。十年前的一九二一年，在俄國革命剛纔告終時，曾去過一次，滯留了一個月光景。莫斯科和十年前相比，已完全不同了。在十年前滯留時，全部商店都關門，糧食的販賣差不多完全看不到，但是這次去一看，商店都已開着，糧食固不必說，衣料及其他也都很豐富。道路等已非常整潔，大的建築物也正在漸漸地建立起來了。走到略為郊外一點的地方去時，這種相異更顯著。宏壯的工廠已漸漸被建立着，一般的生活也已向上至不可與十年前同日而語的程度。我一到莫斯科，就在國際共產黨開始工作，可是野坂這個名字，既因有國際的關係，也有被暗算的關係，所以萬事都不方便。因此立即改了「岡野進」。改成岡野，原不含有什麼意義。不過後來想一想，有野坂的野字連在一起。使用變名的時候，在不注意之際，往往容易用上與自己的名字或家族有關聯的字眼。結果我也竟用上了「野」字。「進」是以前進的心情，隨便加上的。

在莫斯科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最大的愉快，便是閱讀日本的報紙和雜誌。日本的

重要的報紙和雜誌，大概隔了十五天寄到莫斯科。一寄到，就把那些報紙和雜誌從頭至尾完全閱讀。在那裏面，可以體會到日本的姿態和動向，日本的氣息和滋味。這一點，在延安時也一樣。我化了極大苦心，把日本的報紙弄到手。再者，日本共產黨發行的「赤旗」以及其他非法的報紙雜誌，也大抵都能弄到手。

我的主要工作，是這樣搜集日本的情報，把握及分析日本的政治，經濟，革命運動的實情，從這裏再考慮如何推進了日本革命運動才好。並且把考慮的結果，在日本努力實行。爲了這事，由我這方面派同志到日本。到日本幹了一年光景的工作，後來被捕而死在獄中的小林陽之助，也是其中的一人。在一九三二年，參加了有名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綱領』的起草工作。這是對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給了馬列主義的科學基礎的綱領。其後在一九三三年的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中，爲了把當時日本的革命運動家正在進行反對滿洲事變的鬥爭的事實告知全世界，而化了極大的氣力。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舉行的國際共產黨第七屆大會中，我和當時改名爲田中的山本懸藏及小林陽之助一起，作爲日本代表出席。在這次大會中，從世界各國有各種代表到來。在東洋，有日本，中國，越南，荷印，泰國，印度，澳洲，紐西蘭的代表。又有南美各國代表。歐美則不用說全部國家都來參加。大會舉行了大約一個月，有名的狄米托洛夫作重要報告，採擇了那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戰線方針。在國際共產黨第七屆大會

中，我被選爲執行委員，又被選爲常務委員。這個常務執行委員會，是由世界各國有名的共產主義者構成的。例如蘇聯爲史達林，馬納爾司基，芬蘭爲柯西能，德國爲皮克，法國爲陶雷士，馬爾契，義大利爲愛爾可里，英國爲波立德，美國爲勃勞特，中國爲毛澤東，王明等等。

根據這個人民戰線的決定，在翌年即一九二六年，我對日本的共產主義者，關於把這個人民戰線怎樣應用在日本，寫着書簡等。其後，盡量走到與日本相近的地方，以期與日本的運動取得聯絡。在對日本從種種的路綫發送各文書這事上，也曾作極大的努力。在赴延安爲止，我一貫做着的工作，是日本的人民解放運動，即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打倒這種勢力以發展民主的人民運動這事，和使日本成爲更和平的民主的國家這事；爲了這些工作，我覺得已盡了最善的努力。

我們對於九一八事變的開始，大體上曾預想着的。日本大概會對中國實行某種侵略行爲，這事由於政治分析的結果，大體上早已知道了的。在九一八事變終於發生的時候，我們因爲早已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真正企圖是什麼，所以就把它向日本的勞動者及全世界的人民暴露，盡力宣傳使他們奮起作反對這個戰爭的鬥爭，我和片山潛一起寫着檄文和論文。

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還沒有這樣覺得，可是在七七事變的時候却明白地知道了，即



日本已深陷入泥沼。和中國戰爭，絕對不會勝利，結果一定使日本滅亡。在我們公然發表的東西中，也會寫下這樣的意思。

## 二 偉大的片山潛

我在莫斯科，靠着片山潛的指導和援助而進行工作。我和片山潛見面，在一九二一年爲初次，這次是第二次，可是這時，他仍相當健旺，不像七十以上的人，和十年前沒有兩樣。和他相見時，說話總是關於日本的事，日本將來的問題，日本革命的問題。特別是，片山對於日本，比誰都是有極度的珍愛。他到外國來以後，已很長久，離開日本還是日俄戰爭剛告終時，所以他過海外生活已三十年之久，可是對日本的風俗習慣却非常珍愛，例如食物也務必做些類似日本的东西吃，音樂也要聽日本的唱片，諸如此類的情形。我和他一見面，總是專談些關於日本的話。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是革命剛發生以後的事，所以蘇聯還很弱，特別是西伯利亞方面極弱，日本軍部就看中了這點而侵入了西伯利亞。對這事，片山會非常勇敢地鬥爭。他親自跑到西伯利亞，寫着種種傳單。不顧那變六年紀，却到前線幹反戰運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片山對日本軍部的作風，由衷地憎恨着。他和我連名發表聲明，實行反對九一八事變鬥爭的指導。當時片山雖已七十一歲，

可是爲了向外國發表檄文，訴之於世界輿論，却繼續着精力充沛的活動。

在這後，說一下片山潛的爲人吧。

片山潛是岡山縣的農民的兒子，在兒童時代做過農夫。到了青年時代，悟得了做農夫是活不下去的，就到東京去做印刷工。他非常熟知日本農民的狀態，同時也會嘗到勞動者的苦辛。其後，他決定到美國去做工讀生，而出國了。當時往美國去，比較是舒服的，可是他，却不妨說是十足的無錢航行。據說到達舊金山時，口袋裏只剩一塊美元。在美國，曾飽嘗所有一切的苦勞，走讀各地的大學及夜校，可是在這個期間內，漸漸學習美國的社會主義了。他相當學得了美國勞動運動的經驗回到日本。並且和跟他差不多時候回國的高野岩三郎的哥哥高野房太郎——這人與美國的勞動運動是從初期起即發生關係的——協力着，在日本開始勞動組合運動了。曾指導東京市電的罷工，組織日本最初的勞動組合即鐵工組合，又曾組織社會黨，總之是幹着這樣的運動。在日俄戰爭時，則更勇敢地幹着反戰運動。因此被投入監獄，出獄後因爲不能再在日本，就再度到美國。剛巧是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的幸德事件發生之後。其後，他不能回到日本，在美國繼續運動。在美國，在日本移民間組織組合，組成社會主義研究會，同時，也在美國人間做着宣傳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二〇年在美國成立了共產黨，片山潛便是其創立者的一人。他對墨西哥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曾參加。一九二一年，被國際共產黨特別招往莫斯

科，成了國際共產黨的最高指導者的一人。他在日本的革命運動家中是很罕見地，直接指導着國際的運動。和他會見後的印象，與其說是共產主義者，毋寧是像明治時代的志士那樣的風格。正義感極強，嫉惡如仇，勇敢地和他鬥爭。

他在九一八事變當時，曾反對這個事變而果敢地鬥爭，這在前面已說過。其後，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在安斯德坦及巴黎舉行世界反對大會時，他曾挺着老身出席。並且和巴比塞及其他世界有名的反戰主義者一起，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世界和平而作獅子吼。

他從歐洲回來時是七十三歲，可是其後也一直繼續工作着。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是對種種方面的政治問題給與指導。他特別是爲了東方民族而熱心地活動。譬如朝鮮，中國，台灣，菲律賓，以及其他如越南，荷印，印度等的共產主義者一到莫斯科，片山每次總和他們相見，給與激勵和忠言。東方的共產主義者如果到莫斯科去時，必定到片山那裏去會見。到那時爲止，凡去過莫斯科的東方人而不知道片山，不會得到他援助的人，可說一個也沒有。

這片山，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突然生病了。發熱不退。我立即趕到他的房間。立即喚了病院車，陪到莫斯科最好的克林姆病院去診視。病症是敗血症，也請那裏的名醫看過，施用了所有一切的方法。但因爲年紀大了，過了兩三天，意識模糊起來了。有

時回復意識，絮絮說着夢囈似的話，可是那時，他無意識地繼續說着對佐野和鍋山的強烈的憎恨。他說對他們必須徹底地鬥爭。這是表示片山在到死為止，對佐野、鍋山等轉向派非常憤恨着。說了這囈語的，是他死的一天的早上。以後即意識不再回復，就這樣死去了。這是十一月六日，即革命紀念日的前一天。自從片山潛死去以後，我就代替了他，承擔國際共產黨的工作了。

### 三 片山潛的國葬

片山潛的葬儀，是在革命紀念日的翌日即八日，以蘇聯的國葬舉行的。他的棺材被放置在莫斯科的中心地區的勞動組合會館那所宏壯的建築物內，會場被花圈壓滿。雖由兵隊担任儀仗，可是照那邊的習慣，在棺材週圍的四角，必須由四個人交替地站着守夜——不過不是夜而是白晝——。這時，國際革命運動的主要的指導者，都來參加告別式。誰都站到這棺材的四周，担任警護的工作。在那天晚上，遺骸被焚化了。

第二天即九日，在日本說來，這是一般客人來焚香的一天。莫斯科的市民列隊走來。是來向偉大的指導者片山告別。在壯麗的禮堂中，用紅布覆蓋着的棺材放置在高一級的地方。在其周圍的四角，各團體的代表者代替了前一天的我們站着。在棺材的周圍，一般市民一面低頭行禮，一面列隊走出去。這個行列，沒有間斷地從朝至晚連續着。這

好像是日本的告别式。快要到把棺材抬出會場的時候，史達林，莫洛托夫，卡額諾維契等蘇聯最高首腦者及國際共產黨的指導者出現了，他們站在棺材四角的地位警護着。

這事完畢後，就把棺材抬出去。最初是史達林，莫洛托夫這兩人把片山的棺材抬在肩上，開始走出去的。接着由國際上有名的共產主義者皮克，柯納辛，馬爾契，馬納爾斯基，盧左夫斯基，一個一個去交替地抬着，走到等於日本距離二町（每町約三百六十尺）光景的赤色廣場。我和山本懸藏也參加在內。在赤色廣場，莫斯科的羣衆已等在那裏了。在列寧廟的前面有放置棺材的台，把棺材放在那上面，終於開始國葬了。音樂隊吹奏了送葬進行曲。國葬的主席是由皮克（德國代表）担任的，接着由各國共產黨的代表演說。蘇聯爲卡額諾維契，法國爲爾契，中國爲王明（本名陳紹虞），我則代表日本。這事完畢後，即奏國際歌的曲子，同時，由赤色廣場後面的「克林姆之壁」中發二十響禮砲。儀式一畢，就把遺骨納入在「克林姆之壁」中所造的四方約一尺五寸的小洞中，在外面則嵌上寫着「Sen Katayama」的文字的金屬板。這時，我才最初和史達林及莫洛托夫握了手。

置入這個壁內，這在蘇聯是最高榮譽的象徵。在國際的人物中，只有有名的美國共產黨的創立者魯登白，德國的柴特金，和片山潛這三人。作爲日本人，像片山潛那樣享到國際上榮譽的待遇的，恐怕找不出別人。片山是被全世界勞動者所懷念，他的死是被

全世界勞動者所悲悼的。這是日本人民的光榮。

#### 四 被重視的蘇聯兒童

在蘇聯，對兒童的教育化着很大的氣力，而且這事是從產兒時的母親的保護一事開始的。

首先，在女子生產孩子時，產前產後享有大約一個月的照常支薪的休養。生產是在病院裏，在這裏有完全的設備，誰都可以利用病院。在產後三個月內，母親所服務的地方，一天只要工作三小時就行。不用說，工資還是照樣。原來在我那裏工作的年青女打字員，在產了孩子時，產前產後是休息的，其後即使來工作，也只工作了三小時便洋洋得意地回去了。這是法律所規定的。走出家庭時，有寄放孩子的保育所。在早上出去工作時，把孩子寄在那裏，在工作完了回來時，把孩子帶了回家。如果是大工廠，則有工廠附屬的保育所，即使在工作中，也可以每隔一定時間休息着去餵奶。

孩子大起來時，有托兒所和幼稚園等待着他們。托兒所到處都有，並且一定有看護婦，有每個孩子的床。食費也不要。午睡的時間等也有一定，有受過訓練的保姆，母親可以安心寄放了去。利用這個托兒所時，一個錢也不要的。即使是工廠所經營的，也有工廠來完全負擔。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業婦女的最大問題，便是生孩子和不能工作。生下了兩三個孩子，就絕對不能工作。這樣情形，男女平權也就在實質上不能完全做到了。在蘇聯，因為國家有着使你能工作的設備，所以女子能工作，因此在經濟上也能獨立。於是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獨立也隨之產生了。我想這是即使在很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辦不到的。因為如果作這樣的設備，企業就只有虧本，不會賺錢。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由國家去實行，這才辦得到。所以女子的解放，照理也必須達到這一步。學校制度和日本大體相同，有小學校，中學校，專門學校，大學校，可是其費用完全由國家負擔。並且進專門學校或大學的資格，完全憑能力。在那邊，隨便怎樣不熟練勞動者的孩子，也可以進入最高的學校。

並且作為一般的習慣，都把兒童非常重視。對兒童有種種的施設，也實行特別的待遇。例如在百貨公司等，有所謂兒童部，佔着非常大的場所，在那裏有兒童的玩具，衣服等一切東西。又非常便宜。即使是同樣大小的洋服，在兒童部和大人部，是兒童部的便宜得多。

要舉出重視兒童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姑且介紹一、二吧。在莫斯科有個有名的文化公園。在那裏有專為兒童遊玩而設的特別的運動場，建造得非常好，能使極小的兒童遊玩。再在高爾基鎮，那裏的公園中敷有小規模的鐵軌，上面有好幾輛機關車，列

車。兒童在駕駛着牠。駕駛者是兒童，售票員和站長和乘客，統統是兒童，兒童在開行着這個模仿鐵道的全部。這目的在一面給他們娛樂，一面教以科學和技術。在莫斯科還有有名的兒童劇。演員是兒童，看客是兒童，題材也是兒童世界的戲劇。

所以那邊的孩子總是非常爽朗：甚至是任性得過分。可是父母不去責罵。據說如果父母去毆打了，會受到處罰的。孩子們真是暢快。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孩子們不知道失業這事，而罷工也不知道。我因為是外國人，所以孩子拖牢了我，有這樣問，說是你們國家裏有罷工，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警察會逮捕共產主義者，這類事在他們是非常不明白的。在那邊，因為共產主義者是在幹政治，受人尊敬的，所以關於在外國要把共產主義者投入監獄之類的事，就無論怎樣加以說明，也很不容易了解。蘇聯的孩子們，好像以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和資本家階級，是面貌非常可怖的惡人。但是在學校裏，一到了高年級，就教俄國歷史的。因為在俄國史中會教以俄國的封建時代的事，其後成為資本主義和如何發生革命的事，以及國際問題，所以年紀略為大一點起來時，就會大體上明瞭起來的。

## 五 學校種種

同志岩田義道（一九三二年被東京的警察虐殺的共產黨指導者）的女孩子，被山本



懸藏的妻帶了在一九三二年跑來了。她當時只九歲。我決定了把她送入莫斯科的國際學校。這個學校是收容外國的共產主義者的子弟，而施行教育的特別的學校，經營者是國際革命運動犧牲者救援會。學生從世界各國都有來。日本人、中國人、歐洲人、美洲的黑人等等，網羅着全世界的人種。土方與志的兒子也會在這裏。教學內容，為一般的小學校課程和其後的初步的政治教育。

我常常到那裏去，在這個學校，由學生自主地進行，學生的發言非常被尊重着。同時，因為是國際的孩子們聚集在一起，所以當然努力把國際的精神注入孩子們的腦筋。即使在政治教育中，也注重外國的實情和國際關係的知識，其結果，即使很小的孩子，也能對國際問題有着相當程度的理解。

普通在小學校，學生都加入 Pioneer（共產少年團）。共產少年團的團員都結着紅領帶。岩田的女孩子也在國際學校中加入共產少年團，活潑明朗地成長着。我因為最近六年間沒有在蘇聯，所以對她的以後情形不能詳細知道，不過好像已讀畢中學的課程，進了東方語學校在讀着日本語。說日本人還要特別讀日本語，這事好像可笑，但是因為她離開日本時還只是小學三年級程度，所以普通的初步的日本語雖已能讀，可是由於長期間的蘇聯生活，日本語已逐漸忘記了。另一方面，俄語却學得非常高明了。我對她所採的方針，是要完全蘇聯式地教育，所以完全讓她和蘇聯的孩子在一起。現在她的俄語

也許已和蘇聯人完全一樣，或竟比普通的蘇聯人更高明了。她頭腦極聰明，一直是優等生，一徑是一級中的第一或第二名。這樣的她，現在和蘇聯人並着桌子在讀着日本語。她從共產少年團運動而加入共產青年團，現在應該已成爲共產黨員，而在不斷地進行着黨的活動。

此外，作爲蘇聯獨特的學校，有天才教育學校。這學校在我一九二一年訪蘇時，是在莫斯科，現在還存在與否可不知道；牠是集合了是有優秀的藝術天才的少年少女，卽對於音樂或舞蹈或繪畫的技能上傑出的孩子，組織一個特別的學校，由專門的藝術家担任先生，教給孩子們的音樂，或繪畫等。總之是採取着這樣的制度，卽把那樣的才能，使其在兒童時代卽迅速發展。

普通，讀畢了小學，卽入中學。到中學程度爲止，大體上是施以一般的教育，然後是專門教育，進入大學，入大學的資格完全視能力，只要考試及格，誰都可以入學。這些學校，從小學一直到大學，費用完全由國家負擔，此外，對高級學校的學生還給以學費。這個給付的數額已記不得，大體上是足以使學生能生活的程度。不用說，和日本相同，學生大都依賴父母，住在父母家裏通學的。而且，學校全部是男女同學。

在技術教育的方面，有兩個行徑。一個是依着從中學至大學的順序，而進入專門技術的行徑，另一個是讀畢了小學或中學程度的學業，而立即進工廠的行徑。在那種工廠

裏，有工廠附屬的或國家所建的補習教育或夜校的設施，在這裏實行着技術教育。一面做着實際的工作，同時又學習理論。成績優秀者，從那裏可以進入上級的專門學校或研究所。在那邊的技術家中，曾在工廠中實際工作過的勞動者出身的非常多。最近我問過日本的技術家，據說這是最好的辦法。據說日本的學校的做法，因為只教理論，與實際分離着之故，一進工廠，即沒有用處。

## 六 豐富的私有財產、優裕的生活

常常流傳着這樣的錯誤的說法，說共產主義是不承認私有財產的主義。但是如果報告一下蘇聯人民的生活，則這種說法的錯誤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

在蘇聯，所有權的關係，其和別的國家不同的是，土地和資本是屬於國家所有的，工作者是為國家的事業而工作的，如此而已。私有土地和私有資本雖被禁止着，但個人的東西還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如果有錢，也可以貯蓄，如果自己死了，遺產稅雖好像很高，但財產還是能傳給孩子的。

那邊的勞動者很能賺錢。技師等的收入極大。他們賺來的錢，結果除了由自己全部化用使家族的生活過得優裕以外，沒有別的用途。即使想積點錢來買公司的股票，也因爲沒有股票而不能購買。因爲那邊是一種使資本家無由產生的制度。所以只能使自己的

家族的生活過得優裕。私有財產是在迅速地增加。即使像我這樣，在離開蘇聯的一九四〇年那時，也是錢多得沒有辦法用。當時我拿着事務員中的最高月薪一千六百盧布，可是因為妻也在工作着之故，兩人的收入合起來就相當多了。那是用不完的。那末過着怎樣的生活？房間有二間，房租好像是月薪的十分之一。聽說現在房租已按着房子大小而定，可是當時是按照收入的大小而定的。在我住的這個公寓裏，自一切傢具以至電燈自來水都有。要到什麼地方去時，也可以利用汽車。因此，交通費也不大需要。而且我又煙酒都不吃。因為很忙，所以戲也不大去看。即使去看戲，「大歌劇場」因為我是國際共產黨的關係，也可以免費入場。即使買戲票，那也只十盧布或二十盧布，沒有什麼了不起。電影是三盧布左右。此外就是吃東西了，我朝晚在家裏吃，中飯是在辦公處吃的。而且這中飯費，一個月只一百數十盧布。所以有錢多了。其結果，在離開蘇聯時，買了許多公債，也送了些給別人才走的。我們因為並不打算在蘇聯長住，所以沒有買，可是那邊的人無論勞動者，無論農民，無論薪水生活者，一有錢多，就把牠貯蓄起來，買種種值錢的東西。工廠中普通的勞動者，有能够以分月付的方式購買鋼琴的。傢具車輛，各個家庭也是積蓄了月薪，隔了幾個月就能買，而且能買極好的東西。工廠的技術人員更自有備汽車。這樣，蘇聯的勞動者的財產是迅速地增加着。

住宅則大抵由服務的處所給你建造的。工作場所所有的公寓等，也到處都有。如果

是大的工廠，則設有俱樂部。我走到名叫迭那謨這家工廠去看過，那工廠非常大，在裏面有小劇場和圖書館，也有彈子房和運動場。這些都能自由使用。我還在那邊的一九四〇年時，在德蘇戰爭前，蘇聯因為專心於重工業的建設之故，日用品還不很充分，可是從我即將離去前的時候起，輕工業也發達起來了。種種的日用品相當地多起來了。現在我穿的大衣，戴的帽子，穿的皮鞋，也都是那時買的。雖然在延安並沒有多大穿戴，可是經過了六年的今日，仍一點都不壞，像新的一樣。那邊的商品，沒有做得馬虎的。因為沒有想做得馬虎點賺錢的資本家。雖然有人說蘇聯的東西不好，但是看了這個大衣和帽子也可以知道，質地比日本製品好得多。即使和歐洲各國的東西相較，也不見得怎樣遜色。

## 七 打扮的莫斯科姑娘

蘇聯女子的服裝等等，已變得非常美麗了。在以前，俄國女子曾穿着非常難看的鄉下佬似的東西，可是從我即將離去的那時起，已急速地改良了。據說這主要是莫洛托夫夫人的功績。莫洛托夫的太太因為擔任過漁業部長，所以也製造化妝品。是作為漁業的副產品而製造化妝品的。她爲了這事，曾到美國去研究了種種化妝品回來。再者，蘇聯女子的洋服的模式樣也已變得非常美觀了。關於式樣，政府也曾派專家到歐洲，揀選法國及美國的流行式樣中最好的，特別是適於蘇聯的，製成樣本，依照着牠做成女子的服裝。大

概就因爲這緣故吧，蘇聯的，特別是蘇聯都市的新女性，式樣變得非常美艷。大家好像以爲如果是社會主義國家，女子是不化妝的。但是，還是化妝的。搽着雪花膏之類，打扮得非常美麗。在莫斯科，女子果走進化妝品店說要買雪花膏，店員就會看了看顧客的手，而告訴她：對於這種皮膚，應該用這個好，用那個好。

## 八 無賊之國蘇聯

即使在莫斯科，在革命剛發生以後，也有偷兒的。但是我在那裏時，幹偷兒這行買賣的人已沒有了。因爲完全沒有失業者，所以只要不是十足的懶惰者，最低生活總能應付的。因此，幹偷兒的必要就沒有了。

有趣的是，有一所收容不良少年的國立學校。在革命後的內亂時代，有很多因爲父親死去而成了孤兒，而變成了不良。這批人，幹着小偷或扒竊。對他們，依照政府的方法，以澈底加以再教育爲目的，才建立了這個學校。

我在一九三五年，參觀過建在烏發鎮的這個不良少年學校。學生有二、三百名。都是青少年。他們最重要的是學習，特別是受政治教育，並且受特定的職業指導。因爲已經有了懶惰癖氣之故，所以在最初，很不肯聽話，雖然如此，可是好好用力繼續教下去時，他們也漸漸改變過來，各人學得職業了。我們一去的時候，說是國際友人來了，大

家集合起來，盛大地歡迎着。要我演說，我就講了。我說到我自己也會進過監獄時，大家吃了一驚。我又說我的入獄是因為幹了共產主義運動之故，於是大家表示奇怪。我說明爲什麼在日本這個國家，共產主義者要被捕和下獄，又講到監獄的情形，再講到拷問的實情時，大家以極大的興趣聽着。我說，你們做過壞事，以後還打算做嗎？一齊說絕對不再做了。學生都學得了職業，非常活潑明朗。問了一下才知道，學校准許他們自由行動的，可是說逃走的却極少。即使逃走，也大多會再回來的。即使學校方面，也樂於接受逃亡者回來。我們這羣參觀者中，有美洲的黑人在內，跳了一下蹻蹻舞，大家很高興，學生方面也有願意出來跳舞的，跳了一下俄羅斯舞。這樣，我們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蘇聯對於犯罪，大抵採取這樣的方法。即認爲作惡事，是由於社會有缺陷之故。所以要使犯罪絕跡，第一要糾正社會的缺陷，而要做到這點，只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第二，在社會主義國家作惡事的人，不是普通的人，所以把他當作個精神病者看待。並且把投獄使其受苦這事，認爲逆行的辦法，所以對少年偷兒等是這樣處置的。即使對成年的偷兒，也好像以教育爲主。在獄中教以技術，使他一出獄即靠着技術活下。

## 九 休養所生活

蘇聯的療養所以及休養所的設備，是全世界有名的。在蘇聯，由憲法賦與勞動者獲得一定的休養期間的權利，一般說來，每年可得一個月光景的休養。我也獲得過二次。大體上，從初夏到來的時候起，即進入休養的季節。休養所是在蘇聯境內各地的景色優美的地方，設立在海岸地帶。也有利用從前的貴族的別墅的，也有由政府，軍隊、工廠、集團農場新建的。我最初去的，是烏克蘭的叫馬里諾這個地方。在我工作着的地方，也有與休養所有關的事務員跑來問道，你幾時要休養了？我說今年不去了，就被他責備了一頓。他追詰我不去的理由，結果還是不能不去。去雖然決定了，可是那裏去，却不能由自己隨便決定的。先到醫生那裏去檢查身體。然後由醫生決定與健康狀態適合的療養所。不用說，說明自己的希望，還是可以的。

拿了醫生的許可書跑到事務所去，那裏會給你辦理一切的準備手續。會幫助你辦理幾月幾日乘那班火車到什麼地方去的手續。我自己並不需要做什麼，祇搭上指定日期的火車，駛往目的地。我所去的馬里諾，是烏克蘭的鄉村，早有汽車開到火車站等着了。這個休養所，是從前的貴族的很大的別墅，是非常壯麗的建築物。在房屋前面有大樹，庭院非常寬廣。看了這裏，就很可能知道俄國從前的貴族過的是怎樣豪華的生活。一平方公里光景的寬廣庭院的周圍，全部用壯麗的鐵製的圍牆圍着。大概誰都會奇怪，這樣的東西怎樣弄到手的，實際上，這鐵圍牆是從法國輸入的。在帝俄的時代，鐵道也還沒



有發達，所以據說從法國，把這種龐大數量的鐵用船運到列寧格勒，再由鐵道運到莫斯科，然後用馬車從很遠的路程載到烏克蘭。幹這種大規模的麻煩事情，不過是爲了別墅的圍牆。走進建築物，正面有大理石的很闊的石階，爬上去，有極大的房間，像是主人的寢室，排列着華麗的兩張金色的床。隔壁的一間，也置着豪華的床。在樓下也有好幾十個房間，餐廳等等，應有盡有。到這裏來的，都是工廠勞動者和農民。他們到這裏來，在這裏生活，不要化一個錢。因爲在這個休養期間，是由國家的社會保險或所屬機關給與補助的。

在休養所裏，有醫療機關，也有醫生。我一進去，第二天看護婦就來檢查身體。我就是醫生看了也不過說稍爲疲勞一點而已，身體上並沒有什麼異狀，但還是指示了我種種的療法。首先必須照類似太陽光線一樣的東西，並且叫我每天必須入浴。又指定了我在客廳裏用水浴身的神經療法。環繞着寬廣的庭院中央的池子，有日光浴的場所，每天一到中午，全體赤着身子，最初是五分鐘，第二次是多少分鐘，這樣地照規定實行日光浴。所以不能偷懶。但是做了醫生所指示的療法，做了日光浴後，此外就完全自由的。在池子裏搖搖船，游游水，在樹下的睡椅中午睡一下。也有圖書館，可以盡量看書。再者，有特別巡迴來的電影班，放映新片。但是朝晨却不許起得太遲。夜裏也很早就睡。朝晨很早體育教師跑來，這是畢業體育學校後以指導民衆體育爲職業的人。他在休養

所裏教給我們種種體操，也教我們團體舞之類。

食物則給我們吃在莫斯科所吃不到的那種好東西。那裏原是鄉村地方，所以牛奶等等是很多的。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月，體重也增加，並且變成完全換了一個人似地精神充沛。因為吃得好，工作又不做，所以容易增加體重。到最後，因為說身體太怠惰了，所以大家到附近的農場去幫忙，拿了鋤頭趕過去。這樣結束了一個月的休養所生活，拿了醫生的證明書，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地點。

## 一〇 完全的民族平等

由蘇聯生活而深深地感到的是，是民族平等獨立以最完全的形式實行着。

一九三九年，有名的農業博覽會在莫斯科舉行的。規模非常大，蘇聯的各民族造着本地方具有特色的家屋，陳列在本地所製的東西。同時也介紹民族藝術。牠是農業博覽會，同時也是民族博覽會。在那裏令人驚奇的是，各民族保持着獨立的文化，和即使是少數民族，其產業，農業却也非常發達。決不有那是什麼民族，這是什麼民族的那種差別。印象最深的是，偶然我在莫斯科的街上走着時，碰到土耳其斯坦人來在莫斯科觀光。穿着像日本浴衣那樣的，而且在前面嵌有紅綫的大花紋的衣服，和尚頭，以這樣一種異樣風姿，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闊步着。堂皇地像我們在銀座散步一樣，他自己既一點

不畏縮，而看着他的俄國人也全然沒有露出視他爲異民族或劣等民族的態度。看了這，我深深地感動。一切民族都相互地尊重着。在那邊，全然沒有所謂蔑視的這種感情。我當時覺得，這情形因爲是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看到，並且，唯有靠社會主義教育的力量才能做到的。即使在美國那樣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的國家，在美國人與黑人之間也有非常大的差別；即使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了的那種國家，也不能消除他民族的蔑視觀念。在社會主義國家，則在社會經濟制度之上，沒有人爲的不平等。因此，任何民族一律平等的這一觀念，就很容易發生。我覺得史達林自己便是最好的例子。史達林是喬治亞人。在帝政時代會被極度輕視的喬治亞人的他，現在作了蘇聯的最高指導者。這種事如果是在日本這樣的國家，就根本想像不到。不但是史達林，試看一下實際上指導着蘇聯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部員，也可以發見米高揚，白里亞等喬治亞民族出身者。帝政時代會屬於殖民地民族的人們，現在作爲最高指導者而在幹着。

此外，即使在藝術方面，各民族的藝術也非常發達。在蘇聯最東部接近新疆省的阿爾馬·阿塔等地，也有很大的壯麗的歌劇場。在日本，歌劇場連一個都沒有。因爲歌劇苟非經濟上極有餘裕是辦不到的，所以即使歐美，歌劇場也只在各國大都市有一兩家。再者，在莫斯科，有民族代表跑來，舉着藝術競賽會等。各民族也定期跑來，舉着獨特的舞蹈等。少數民族像吉卜賽等，其在蘇聯所受的待遇，也和在歐洲各國所受的完全

不同。流浪的民族吉卜賽，現在已停止流浪，定居在一個地方而做了農民。在莫斯科，也有特別為吉卜賽設的小劇場。吉卜賽在世界上雖是最難處置的民族，但是蘇聯却完全成功了。

這種民族平等融洽的最好的表現，可以在今次的德蘇戰爭中看到。希特勒的所以進攻蘇聯，其原因之一，是爲了這樣的希望：蘇聯如果繼續苦戰，在聯邦內部一定會發生民族間的分裂，開始民族反抗，民族鬥爭。至少，民族的統一將破裂。好像是抱着這樣的估計才進攻的。但是正如事實所昭示，這種期待完全是算錯的。

我在歐亞各國遍歷過，可是最令人愉快的是蘇聯。無論在倫敦，巴黎，柏林，或許是我的偏見也未可知，總覺得作爲日本人而被蔑視着，受到特別的處置。在租房子的時候，相當麻煩。在蘇聯，則這種差別待遇完全沒有。這個民族全無差別的前提，固然在於所謂物質條件的同一這點內，可是同樣，教育的力量也是重要的。敵視他民族，或認爲自己民族優越，像這類的教育，必須完全消除，這是很切要的事。

## 一一 指導者的印象

蘇聯的指導者所共通的特徵，是樂於爲人民服務這事；他們的行動和生活，全都被這個意志所貫徹着。

(A) 史達林

我和史達林，雖並沒有會見過多少次，可是知道他是非樸實、謙遜、老實而親切的人。好像列寧也是同樣典型的人。我記得在史達林的著作中，曾敘述着列寧是何等謙遜而老實的人。史達林最初見到列寧，是在芬蘭的黨大會的時候。那時史達林還年輕，可是到會場上去了。史達林從那時起已非常崇拜着列寧，而且他心裏想，所謂偉大的革命家一定是威風凜凜，身體也一定魁梧，相當趾高氣揚的。並且他這樣想像着：參加集會的時候，一定不是很早就到，要到最後才來，在大家等得有點心焦時出現，接受人家的拍手。但是史達林在開會時間前走到會場一問，據說那個人就是列寧。列寧比誰都先到，拖住了勞動者，正在角落裏竊竊私語着。史達林受到了異樣的感覺。因為和他一向所想像的政治指導者，典型完全不同。可是史達林在那時却感到了真正的民衆指導者非如此不可。這些都是他在那本著作中所說的。史達林還說：對民衆並不趾高氣揚，却具有謙遜而親切的態度，這才是新的指導者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在蘇聯的大多數指導者中都能看到。

再者，看了他的文章也可以知道，即使是非常難解的理論的話，一到他的手裏，就寫得誰都能懂的淺顯，叫人發生真是大衆的，民主的政治家的感覺。

有人說在蘇聯，把史達林當作偶像，但這話是錯誤的。第一，他從俄羅斯人看來，

是殖民地人。這樣的他，現在却成爲蘇聯全體的最高指導者。這事，即足以證明完全憑他的能力所致而有餘。這不是父傳子似的世襲，却是真正的力量。這是他從青年時代起獻身地一直幹着革命運動的結果，才獲致現在的地位的。第二，他所實行的政策，一直是正確的。他所做的工作，總是成功的。這點，在革命前，在革命後，以至在現在，都被證明了。特別是在這次戰爭中他的力量，是燦然發着光。俄國人都把史達林認爲給他們實行了革命的人，實行了社會主義的人，挽救了國家危機的人。和日本の天皇不同。一點都不是什麼偶像。是因爲有實際的力量，有功績，所以人民真正感謝和尊敬着。他把一生獻給人民，他曾多少次被捕入獄，但這並非爲了個人，完全是爲了人民。——全體人民在由衷地這樣感謝着。

一個朋友對我講過這樣的故事。那是某年的勞動節的事，在赤色廣場上有幾十萬人進行示威運動，我的那個朋友和一家印刷所的勞動者結隊前進着。在他的旁邊，有個從鄉下出來的女子。史達林站在列寧廟前。隊伍漸漸走近史達林的面前時，這個女子拿出手帕頻頻揩着眼淚。她說因爲看到了史達林先生，所以高興得完全無法抑制。這是蘇聯人民對史達林的真正的感情和心理。看了實際情形，就可以知道人民對他的態度，其性質全然不是什麼偶像崇拜。

大概已是十年前的事吧，英國的艾登就任了外交部長後，曾先去會見希特勒，又去

會見史達林。後來外國報紙報導着艾登所得的印象。據這個報導，則艾登會見希特勒時，好像希特勒會拍着桌子，氣憤高得不得了。艾登對這個希特勒，得了很懷的印象。但是去會見史達林時，却是溫文爾雅，說話也很具體，說是獲得了非常好的印象。我覺得說得一點不錯。

### (B) 狄米托洛夫

在莫斯科的外國共產主義者中，我從狄米托洛夫得了最深刻的印象。這個保加里亞共產黨的代表，是新的革命偉人。我因為在他的指導之下，和他一起工作着之故，關於其個人方面也很知道，他對人也是非常親切的。他的特徵是，活動舞台非常寬廣，對於各國的情形，比誰都具體地清楚。而且他，又完全把握馬列主義的理論。他把這種理論，按照各國的情形，個別去應用。在一九三五年被採擇了人民戰線這個戰術，也是由於狄米托洛夫的力量，這是以他的長期的經驗為基礎而製成的。最近，他又在保加里亞組織所謂祖國戰線，展開着極大的政治運動，這些也是非常決斷的作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勇氣才真值得驚嘆。這點，在一九三三年他在萊比錫受納粹審判時，最足以表現。那時，他自己已覺悟着當然會被宣告死刑的。可是他還在納粹的法庭上，以納粹的指導者戈林，郭培爾等為對手，把他們徹底地攻擊。這是正因為他有非常大的勇氣，才能這樣做的。被置在那樣的狀態中，一點都不着慌，非常鎮靜着，使全

世界獲得了這樣的印象，即好像是反而由被告的他，在審判着納粹。結果，他把全世界的輿論，引到了呼籲「救援反納粹的狄米托洛夫吧！」這個方向。這樣的審判，在全世界都罕見的。

我最後離去莫斯科往別國去時，狄米托洛夫特地請我喝保加里亞式的咖啡，向我說着將來應注意的事。我至今不能忘懷，他那大而銳利，却又在其深處蘊藏着溫暖的眼睛。



### 三 延安生活

#### 一 從蘇聯到延安

在一九三九年，我正理頭幹着「蘇聯共產黨小史」的日譯的主持工作。這書是在史達林的主持之下寫的，那裏面不但敘述俄國的革命運動，也有着關於共產主義的深刻的經驗和理論。牠發行的時候，蘇聯人民熱狂地歡迎，共產黨員則把牠認爲不可不讀的書。這書即使對於外國的共產主義者也是最重要的教科書，而迅即被開始譯成二十幾國文字了。這書的日語翻譯，真是嚴密地實行，例如在最初，把由俄語譯成了日語的稿子，由精於日語的俄國人看過，由日本人把牠再看一遍，再要把牠校閱二次，是這樣地採取着一字一句都不能放鬆的態度。有的俄國人，甚至祇因爲弄錯了一個字，就遭受了黨的譴責。我雖担当了這個日譯本的工作，可是因爲鉛字的關係，要在莫斯科印刷是困難的，所以交由美國的出版社出版，然後將牠秘密送入日本。這工作伴隨着極大的困難。但是至少，應該已有五、六本到了日本。

這個翻譯，是非常重大的工作，我把牠完成後不久，就發生了希特勒侵入波蘭的事，世界情勢一齊開始新的轉變了。於是，我自己爲了日本，不得不着手新的工作了。

不過在這以前，我也曾把在莫斯科養成的日本共產主義者，派了相當的人數到日本，這些人回到了日本，作了種種積極的活動。我在蘇聯雖住了九年，可是實際上，住在莫斯科的時間不過是其中一部份而已。大部份時間，我總是盡量住在與日本相近的地方，秘密進行着非常危險的活動。我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開始了，所以又向和日本接近的地方出發了。這次，先決定潛入日本所佔領着的華北，其後由滿洲進入了華北。

我從莫斯科出發，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其後抵達延安的附近，是化了相當時間的。我的到延安去的第一個目的，是爲了要到日本，爲了這事，就擬定這樣的計劃，即先在天津方面或上海方面置着據點，等待機會，而在這個期間內，則就從這邊對日本工作。並且我這樣想着，如果這個計劃不成功時，就對居留在中国的日本士兵及僑民，進行政治活動，在他們中間掀起反戰運動，此外，更教育日俘，以養成爲日本民主主義革命而挺身的同志。爲了這事，所以我雖然住在延安的附近，却有很久的期間不得不用中國人的名字作不合法的活動。

從莫斯科到延安去的旅途，中國共產黨員曾給與極大的援助，靠了這點，我才能完全裝作中國人，而且並沒有遇到多大妨碍而能進入中國的。當然，在我的身邊，常常有日本的官憲或國民黨的官憲盯隨着，可是幸虧沒有能發見我的底細。

我抵達延安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指導者的大部份人，集合了起來，對我

行了盛大的歡迎。我在莫斯科認識了一個指導者，竟至抱住了我高興得流下淚來。到那時爲止，八路軍雖然和日本軍打着仗，可是關於日本的知識並不充分，而且因爲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八路軍裏也沒有，所以對我的抵達，是非常歡迎的。但是我因爲已改了名字，所以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我在那裏。

## 二 研究祖國是第一項工作

我把自己的所在祕密着，而組織着和指導着日本人反戰同盟（後來變爲解放聯盟）。不久，得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援助，作爲教育日俘起見的學校，而開始設立了勞農學校。爲了設立這個學校，毛澤東先生曾出了很大的力。因了這個運動，在中國人之間，日本研究熱也迅速地高漲起來了，所以爲了這些中國人，也設立了日本問題研究室。但是最麻煩的是，日本的報紙和雜誌不能到手。爲了這事，曾遭受不能想像的苦勞，其結果，容易在一年之後，這些資料才漸漸地能夠到手了。

到延安，也和莫斯科時同樣，閱讀日本的新聞和雜誌，是我每天最大的工作，也是最大的快樂。牠們一到，我就貪婪地把牠們每個角落都讀到，在那上面觀察日本的姿態，知道了祖國人民的生活。

我那裏，除了「東京新聞」之外，如「朝日」、「每日」、「讀賣」、「日本產業

經濟」，凡是東京的報紙幾乎全部都有；再加上大阪的報紙，以及九洲的「西日本」、滿洲、北京、太原等的報紙。同時，除了「同盟通信」、「同盟世界週報」、「時事月報」等之外，東京的雜誌也全部都到手。一時曾到有四十種左右的雜誌，不過時時有脫漏的，這點很遺憾。從日本到延安，大體需要一個半月光景。我最近的報紙，看到七月十六日的。

但是把牠們弄到手的方法，却真是拚性命的。先和太原等那樣的大都會的中國人中在職的校長或官吏接洽，叫他們各購訂一份日本的報紙或雜誌。如果一個人購訂三、四種，即會被疑，所以無論如何只得每人一份。把這樣弄到手的報紙雜誌，打成小包緊貼在身上，在汽車等等什麼都沒有的路上，多少突破危險的日軍警戒綫，驛傳式地傳遞的。只要一突破警戒綫，再往前去，則因為八路军就會用馬來代運的，所以就比較省事。

但是在中途被日軍發見了藏有小冊子等的小包，而被當作間諜殺死的，也曾有三、四人。

反戰同盟的無線電報真是便利，這是在延安的報館方面忠實地收了後，把必要的地方發表在共產黨的報紙上，或以特別消息的形式，把東條的演說或戰況之類，在指導者間分發。

收音機，也因為收聽着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播音之故，所以雖然在延安的山中，對於日本的情形，也能知道得或許較日本內地的人民更清楚。至少能正確地客觀地觀察着，這是事實。

### 三 日俘的教育

我在延安附近過着不合法生活，組織着勞農學校的時候，學生祇有十幾個人。他們都是被俘的日本的兵士和僑民，他們的思想還完全是日本軍隊的軍國主義思想，對我們的學校也抱着極度的憎惡與反感。因為是這樣的學生，所以學校究竟能否圓滿進行，在開始時我也並不怎樣具有自信。最初我在學校裏對學生講話時，他們的大部分都以白眼對我。但是我一徑確信着，我們的思想終有一天會被理解的。這是到了後來才聽到的話——說是有幾個學生在天長節，會偷偷地爬登學校中的山上喊着「天皇陛下萬歲」。對這樣情形的學生，我開頭幹的事是，叫他們徹底自覺他們是戰爭與軍閥的犧牲者，和了解現在的世界正在怎樣變動着。這是使他們對日本睜開批判之眼的事。和這樣的講授相併行着，我又盡量把他們的生活狀態改善，也盡量把日本的情調等注入他們的生活。一方面，又動員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使其成爲他們的好友，努力想藉此漸漸喚醒他們的感情與意識——即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本沒有什麼仇怨，一點都沒有非互相殺戮不可

的理由。這事對於使他們啓蒙一點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力量。但是，這樣的教育決不是順利地進行的。在他們中，有着無論如何不能擺脫軍國主義觀念的人。這批人，在學校內部會幹過種種的破壞工作，可是對於這樣的人們，一方面採取着用一切方法去說服的方法，同時，如果這樣也無效時，則也採取着舉行學生全體大會以大衆的力量批判其錯誤的這一民主的方法。不久，學生漸漸多起來，變成五十名、一百名了。於是，其中也有非常優秀的人進來了，而且這種人漸漸變成學校的中堅了。特別是，岡田文吉從日本備嘗了艱苦跑到延安來時，我非常地高興。當然，與這樣的事同時，強烈的軍國主義者也有很多進來了，但是這批人，也因着幾個月或一年的教育，而大體上變爲採取反對戰爭、反對軍部的立場了。

學校規定以一年半左右，授畢課程，讀畢了的人相繼往前綫，開始實際對日本軍隊的宣傳活動。這時，代替了這批人，又有從前綫新送來的日本人。這樣，即使在日本軍隊間，也都知道有勞農學校存在，同時，我在延安這事也被日本軍隊知道了，因此從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日軍方面也把特別養成的間諜送到這邊來了。其採取的方法，先選擇日本兵士中具有最頑固的反動思想的人，施以三個月光景的使他們能幹間諜工作的特殊的技術訓練，其中包括聯絡方法、通信方法、情報搜集方法、以至暗殺方法。這些訓練完畢後，就使他們巧妙地潛入八路軍中。在這個場合，中隊長等把他們喚作英雄，並

且和他們相約，如果計劃成功時，金鷄勳章固不必說，還可以獲得鉅額的獎金，這樣才使他們向八路軍出發的。他們潛入八路軍時的理由，大抵總是說什麼受了日軍虐待才逃出來呀，或者反抗了上級官長呀，再不然，就是說他自己具有革命思想，憧憬着八路軍才跑來呀，取這類的方式。

我們在一起先，對於這種間諜的潛入，曾疏忽着。所以在有些地方，八路軍甚至把這種間諜當作勇敢的日本兵士，舉行歡迎會，大大地加以優待。所以在那時，間諜能自由地搜集種種情報，而和日軍取得聯絡。他們的任務，除了搜集八路軍的軍事情報外，又調查日人團體的幹部及團員的名字和來歷等，還調查這種團體在幹些什麼。而且奉有這樣的命令，即在即將從八路軍中逃出時，盡可能地暗殺八路軍或日人團體的幹部。我的頭顱，是被懸了賞的。因此，他們不但帶了毒藥之類，還學得了用武器等殺人的方法來的。但是不久，我們覺察着間諜的潛入了。於是，對這事開始採取預防方策了。我不但努力監視間諜的舉動，而且努力教育他們，務使其自己告白是間諜。爲了達到這點，盡量不去敵視他們，使其在自己的心裏發生內部鬭爭，因此能使間諜對我們所加的危害止於最小限度，而且自己告白爲間諜的事也發生了。他們原來不是職業的間諜，而是從兵士中跑來的，所以如果這方面注意一下，就很容易知道的。

#### 四 對日軍的政治活動

勞農學校雖是在延安的，但是在華北、山東、華中等地域有着解放聯盟的支部，日本人在那裏用一切的方法，對日本軍隊進行着政治活動。而且這種政治活動的重點所在，是使日本的兵士知道戰爭與軍部的罪惡，使他們在軍隊內部向軍部進行鬭爭。並且愷切地說明：要真正地拯救日本人民，不能靠現在這樣的由軍閥、官僚、財閥、大地主所支配着的日本，却必須建設由勤勞人民所支配的民主日本。我們的口號是「反對戰爭」、「反對軍部」、「建設民主日本」這三個。這個宣傳活動，真是危險的工作。但是同志們却勇敢地把傳單和小冊子等，散給日軍的陣地，或直接向日軍的地下堡壘說話，或者爲了向正在戰鬭中的日軍呼籲，而跑到最前綫。因此，同志中了日軍的彈珠而倒下的事，也常常有的。據我所記得的，這些犧牲者至少有十名左右。再者，有時在地下堡壘與地下堡壘之間的電話綫上，把我們的電綫結上去，藉以向日軍的地下堡壘說話。由於這些宣傳的結果，日軍內部的兵士的心境也相當變動起來了。當然，對於這些宣傳，日本兵士在起先，是表示強烈的反感的。但是執拗地這樣反覆做下去時，漸漸地對我們所說的道理理解起來了。例如——這是北京附近的事——有一次，我們的同志用電話向日軍的地下堡壘說話，於是，對方就大罵一聲「賣國賊」，而砰地一聲把電話掛



斷了。但是第二天再走出去打電話時，這次對方却開始聽了。於是，我們就把日本兵士生活的惡劣，此次戰爭的性質，此次戰爭的將來，日本軍閥的罪惡，以及家族的近況等等，心神貫注地一樣一樣說下去時，那個兵士，就開始覺得我們的話是真實的。而且最後，則從對方共鳴起來了。並且要求我們和他通信了。再在另外一個地方，則有過這樣的事：一個日本的二等兵，由於和我們的同志通信的結果，相約而談，祕密地走到我們所指定的地點，一面吃着水果等，一面由衷地交談了之後才回去的。因為把一層軍服卸去時，他們也是勞動者，農民，知識階級。對於這種勤勞者，只要向他們諄諄地說明他們是戰爭與軍閥的犧牲品時，則他們中會醒悟着作為勞動者或農民的自覺，而向我們接近過來，這是當然的事。這個二等兵，也在其後又與我們的同志交談了二次之後，結果就加入解放聯盟，發誓要在日本軍隊內和我們聯絡，同時進行反戰活動了。日軍的逃兵，越近戰爭結束，越是迅速地多起來，最近進了延安的勞農學校的新生，其中幾乎有一半便是這種逃兵和自願投到八路軍來的。

此外，又有一次，在太原附近發生了有趣的一件事。在太原附近，有一家日本的肥料工廠，那裏的日本職員和八路軍的兵士要好起來，他把日軍的情報不斷向八路軍報告着。因此，八路軍對這個工廠，決不加以襲擊的。有一天，解放聯盟的一個盟員，被八路軍的兵士帶同了到那家工廠去時，那裏的職員大大地歡迎，因此就決定在那裏住一晚

了。可是那裏的職員說，這附近如果過於少遭八路軍的襲，會被日軍懷疑的，所以有幹一下假戰爭的必要。於是，就決定在第二天實行假戰爭了。八路軍的一小隊從小山上向工廠大大地開着空鎗時，職員方面也不甘罷休似地起來應戰。這樣幹了一小時之後，就向日軍方面送了這樣的報告：『八路軍會來襲擊，但已完全將其擊退。』因為時間已過了，所以我們的同志和八路軍的三個同志，決定再住一晚。可是第二天，突然有少尉帶領的一分隊的日本兵跑來了。於是尋根究柢地詢問着和八路軍交戰的狀態。職員很妥當地回答着。後來，少尉却帶了那許多兵一齊走進屋子裏來開始搜查了。事情到了這步，八路軍的兵士和解放聯盟的盟員，已都沒有逃脫的餘地了。如果能够用話來圓滿地騙了過去，固然好，如果被看出了底細，那就當然要被殺死的。但是，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那個職員却跑來，若不介意地說，這些人是廠裏雇着的苦力，現在在休養着；這樣才容易逃脫了虎口。

我在中國所幹的反戰活動，的確是出於真的足以拯救日本民族與勤勞人民這一信念。此次戰爭，是我國的極少數支配者即軍閥和財閥，爲了自己的私慾而掀起的，是足以陷我國於毀滅的戰爭。人民大眾，是被軍閥所脅迫，或被軍閥的宣傳所欺騙着，才被捲入了戰爭的。所以唯有反對軍閥的戰爭，早一天使其停止，才真是愛日本的人應有的行爲。也唯有在戰爭期內在我國戴着愛國者的假面具而煽動戰爭熱的人，才實在是危

害國家的非愛國者。

## 五 優厚的八路軍對俘虜待遇

我到了八路軍去以後覺得出乎意料外的事是，八路軍對日本俘虜的政策完全與日軍對中國兵的相反。日軍俘虜着八路軍兵士時，就加以所有一切的侮辱與虐待，因此而有很多人被慘殺。即使不被慘殺，普通也總是強迫使其勞動，或投入收容所。但是在八路軍的方面，却嚴禁着對日俘加以侮辱或虐待，而是親切地當作友人似地教育着的。這是作爲朱德的命令而遍告一般八路軍兵士，在不久，這種教育已相當地徹底行着。當然在最初的時候，在八路軍兵士自己也好像不明白其理由。因爲日軍方面，只要看到是俘虜，就統統加以虐待，甚至把他的父母兄弟都慘殺，這種情形是八路軍兵士所親眼看到的，因此，他們不能明瞭這個對日俘寬大的命令，毋寧是當然的。但是八路軍政治部方面，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指示，爲了使八路軍兵士明瞭所以必須寬待日俘的理由起見，會不斷地努力着。總之說：八路軍的戰爭的對手是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不是日本兵士，因爲他們只要一脫下軍服，就是中國的勤勞者所必須緊緊向其握手的勤勞者，結果，他們不過是軍國主義者的犧牲品而已，中國共產軍應該和他們握了手，和真正的敵人即日本軍國主義戰鬪。——是把這樣趣旨的話反覆地教着。因此，雖然在戰爭的初期也曾有過

八路軍兵士殺死日俘的事件，但是等到教育行得徹底了時，這種事件就逐漸減少，我到了延安以後，和政治部協力着益發加強這種教育，其結果，八路軍兵士也變成以友愛的目光看日本人。所以日本的兵士，起先以爲一成了俘虜一定會被處殺的，可是因爲八路軍的官佐和兵士都親切地待他們，所以他們的心理也漸漸改變了。有時，中國的旅團長甚至把日俘帶到自己家，請他吃飯。日俘的伙食及其他，也只有比了八路軍兵士的來得好，並且，雖然作了俘虜，却被容許着行動自由，因爲是這樣的待遇，所以最初在日兵士好像完全覺得莫明其妙。所以有許多俘虜，會這樣想過，大概被請了吃飯之後，就會被殺死吧。再者，遇到是日本的傷兵，則用所有一切的方法給他治療，甚至有八路軍兵士自願給日本兵輸血的這種美麗的情景。這種事，不僅對八路軍兵士，即使對華北的百姓也同樣地這樣教育着。因此，日俘如果在延安街上買東西時，百姓會比了對中國人自己更親切，甚至比普通賣得更便宜點。到了新年，百姓把勞農學校的學生請到自己家裏，全家和他吃飯，這類事也是每年都是一樣的。在受着這樣的待遇時，日本兵也慢慢地開始明瞭八路軍的性質，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以及此次戰爭是侵略戰爭，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必須攜手等等了。這樣種種的事，常常成了日俘欲成爲解放聯盟員的這一思想轉變的開端。

## 六 延安這地方

延安在中國也是有數的古城，位於從西安向西北徒步約十天，從太原向西南走約一個月的地點。延安的市街，在兩邊都是山，在其中央有小河流着。市街像中國普通的市街一樣，有城牆圍繞着，我去那裏時，房屋差不多已完全被日軍的空襲所破壞，沒有人住着。我看了這種破壞的殘跡時，血液如沸的一般憤怒。這是因為對於把這樣毫無軍事價值的市街竟至如此徹底地破壞的，日軍的野蠻，雖然我是他們同胞，也不禁感覺憎惡。

這樣，在延安的從前的市街上，人們已不能住了。幸虧延安的泥土是粘土性的赤土，所以八路军就利用了牠，在山腰中開始穴居生活了。我到了延安，告訴我說今後要住在這個穴洞時，我稍稍吃驚了一下，但是當真住了看時，却比了日本的租屋居住，有着好的地方。夏天很涼快，冬天則不但泥土完全凝凍，而且從什麼地方都沒有可以吹進風來的隙縫，所以比較溫暖。但是在這裏，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燈。晚上只能點了洋燈工作。最初覺得不便於看書，可是習慣了，也就覺得不妨事，這樣可以了。比了近來東京這樣會因停電而突然變成漆黑一片，以致狼狽的情形，毋寧要好得多。不過，也許因為用洋燈的緣故吧，眼睛却變壞了。因為這種洞穴的房屋，是在山腰中二樓、三樓、四樓似地排列着之故，夜裏一看，則洋燈光外漏，叫人想像着恰巧東京「丸之內」的夜

景。

這樣的穴居生活，無論毛澤東先生，無論朱德先生，也都是一樣的。但是隨着延安的經濟狀態漸漸被改善，日本的空襲也沒有，在市街上，木造或石造的房子已開始出現，像共產黨總部的某處，已建造足以容納千人左右的宏大的磚砌的洋式會堂了。

在延安的附近一帶，不產米。麥子也只能收穫到很少的一點。那裏能產的，主要是小米，居民的大多數以小米與麵粉的饅頭爲經常吃的東西。蔬菜和豬、羊等，雖有相當數量，但這也不能說充分。因此，在八路軍以及其他機關工作着的人之中，關於伙食，現在大體上有三種區別。第一種，是一般的兵士或工作人員的伙食，這以小米爲主，有少數的饅頭和蔬菜，每星期有二、三次豬肉。第二種，是科長階級的人，這比了第一種在分量上略爲多一點。第三種，是軍隊和黨的最高指導者，因爲他們必須補給足以擔當重要工作的營養，是由於這樣的意思，所以供給他們以比第二種更好的伙食。我吃的是第三種伙食。但是在戰爭的初期，官佐和士兵，是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一的待遇和吃着同一的伙食的。好像因此，毛澤東先生和朱德先生的身體受了影響。這事從政治上看來，是很大的損失，同時，因爲延安的經濟狀態也已漸改善，所以自然地把同一的待遇加以修改，而採取這樣的政策了，即對於担任着過重的工作的指導者給與相當程度的優待了。

看了毛先生的八九年前的照片，則這瘦骨嶙峋地穿着不整理的衣服，這樣子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也是一樣；可是隨着過去數年間的經濟改善，邊區全體的生活狀態的向上，毛先生的健康也很顯着地回復起來了。在前年，重慶的新聞記者曾到延安來。因為在重慶方面，謠傳着毛先生有肺病，雅片上了癮，所以記者們好像想像着毛先生一定是瘦損病弱的。可是在這批記者面前，突然出現了六尺昂藏氣色很好風采堂堂的毛先生，所以他們還以為是另外一個人。這是隨着邊區人民生活的向上，而毛先生的身體也胖了起來的。

關於衣服，則雖是現在，指導者和兵士也還穿着幾乎完全一樣的東西。我那時所穿的衣服，也是延安的用草汁染着手織棉布的衣服。朱德總司令也穿着差不多和一般兵士完全相同的服裝，所以常常有人把總司令錯認作了兵士。

一般說來，延安的生活是苦的。特別在娛樂方面，非常缺乏。電影院和戲院等，連一家都沒有。有一次，有一對日僑夫婦成了俘虜到延安來。這女的，到了延安首先這樣問，今天星期，想去看電影，不知什麼地方有電影院？八路軍兵士被她這樣一問，竟不知怎樣回答了好，而給呆住着。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才有美軍帶來了電影；在這以前，我看電影的機會只有過二、三次。就是戲劇，也每月只能看到一、二次新劇或舊劇，至於其他說得上是娛樂的，完全沒有。祇是在星期六晚上跳跳交際舞之類，這大概就算是

延安文化唯一的娛樂了。而這種跳舞會，又是說來駭人。在延安的中央有個名叫桃林公園的很小的公園，總之在那裏的蘋果樹和桃樹下，點起了很大的火油燈，圍起一個圓形來跳着。音樂則因為沒有留聲機，由兵士和學生組成的外行樂隊，演奏着狂暴的跳舞曲，是合着牠的拍子而跳的。說起跳舞，好像總是紳士淑女幹的，可是一看他們的服裝，男的女的却一律穿着破舊的手工製的軍服，因為是這樣的情形，所以叫人覺得是有點異樣的光景。在延安，男女都穿同樣軍服，所以不大有什麼明顯的區別。祇是女的胸前略為攤開一點而已。

起先，說是因為奇怪的跳舞會，所以一直不請美國人等參加的，可是後來被美國人知道了，他們說這樣鄉土情調很豐富，而也樂於參加起來了。毛澤東先生也說這是等於運動，而跑來參加，朱德先生也參加。但是這些指導者的跳舞，無論怎樣看去，總覺不大高明，像毛先生那樣，竟像是在體操一樣的跳舞。我雖也常常被邀請參加，可是終沒有加入。我是這樣回絕的，說：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已獲得政權，但在日本，則社會主義革命固談不到，即使民主革命也還沒有成功，所以在成功以前，不預備享樂。

延安的人雖只二萬，但把近郊也算入，則有十萬左右。在那裏的外國人，以日本人和朝鮮人為最多，日本人約有二百五十人，朝鮮人約為三百人。從一九四三年起，有美國的攻察團跑來滯留着，此外，蘇聯則只有塔斯社特派員及其助手和一個外科醫生這樣



三個人

我在未去延安之前，曾以為八路軍一定從蘇聯獲得着相當多的武器等等的接濟的，可是實際上到了那裏一看，而感到了意外的事是，八路軍從蘇聯一點都沒有得到什麼接濟。不用說，從美國也沒有獲得一件武器的接濟。八路軍的武器的大部分，都是從日本軍或國民黨軍肉獲的東西，八路軍並未從蘇聯獲得任何援助，這是甚至使視察了延安及前綫以後的美國視察團都吃驚的事。八路軍是差不多完全不受任何地方的援助，而完全以獨力在八年中和日軍戰鬥了的。如果要說得了外國的援助，那大概只有我們這些日本反戰主義者啦，朝鮮獨立運動者吧。

## 七 邊區的政治

以延安為中心的邊區的政治組織是，根據最進步的民主主義的原則，對十八歲以上的男女賦與選舉權；這選舉是自由的選舉，可以從自己的朋友中選出議員，是這樣的組織。在延安的邊區議會中，有農民，有地主，有商人，有學生，有軍人，有官吏，有學者。就政黨說，則有共產黨，也有國民黨。並且為了避免祇有共產黨佔優勢這點，採取着所謂「三三制」的原則，即共產黨與國民黨與其他人士，三者都以同樣的比率以組織政府，是採取着這種方法。因此，假定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得了多數，就得減低至「三

三」這個比率。這是共同戰綫的辦法；雖然在實際上，是以共產黨的指導而幹着的，但是這始終不是化了氣力去爭，却採取着讓人家贊成後才這樣幹去的方針。在那些議員之中，也有過去曾被俘虜過的日本人。這是因為他們是日本軍部的反對者，在這樣的意味上去選舉他們為議員的。像現在業已回到了東京來的吉積，便是此中的一個。女議員當然也有。在延安邊區，女子的地位完全和男子同樣，不但享有選舉權，而且他們即在政治上，或其他的地位上，也絕對沒有說是因為她是女性而被置在較低的地位。女縣長也有，女校長也有。即使在共產黨的八十名左右的中央委員中，也有四名是女性。關於勤勞婦女的產前產後的休養，是模仿蘇聯的制度，給與一個月的薪水照支的休假，配給在生育時所必需的布、衣類、營養品等等，此外，又是可以免費入醫院使其生育的。即使對於產出的孩子，政府也給與特別的津貼，直到孩子滿五歲為止。所以在延安，生孩子這事，並不成為父母的負擔，甚至反足以使父母的生活變得更好一點。孩子一出生，政府即給與一隻雞，這也是出於一種溫情的週到顧慮，爲了使母親的乳水可以多一點。

邊區的農民的政治自覺，比了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民要前進得多。這事甚至使前年美國新聞記者來的時候，知道了當地農民對種種難解的政治問題具有理解，並且實際上這種農民也的確以民主主義的方法在參預着政治，而很驚奇。農民把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完全當作他們自己的，把其指導者則認作自己的親切的父母一樣。八路軍在八年中能和

日軍戰鬥不屈，固然也由於八路軍兵士的勇敢行動和其指揮官的正確指導，但是一般農民的協助八路軍，和其一起行動着參加戰鬥，却也是不容忘却的大原因。關於這點，有着下面這樣的例子。在延安附近有一個名叫吳滿有的農民，他在十年前八路軍還未到延安來時，是非常貧窮而過着很苦的生活，可是八路軍一來，給農民以土地，採取着種種保護農民的政策，自此以後，他得力於這些措施而大大工作起來，關於耕作方法，也想了較普通農民爲新的方法，不住地完成着生產。同時，邊區政府也大大地援助他，因此，吳滿有的生活越發好起來，到了現在，他除了土地之外，房子也造起來了，牛也多少匹養起來了。他認爲這一切都出於中國共產黨與八路軍之賜，而加入了共產黨。這樣，在前年國民黨軍有襲擊延安的趨勢時，他拿了槍站在許多農民的前頭，發誓着爲了防衛邊區而與八路軍將兵共同作戰，實際地組織了農民。這是一個農民的例，可是像這樣的例，在邊區到處都有。今日中國共產黨的能在中國指導着一億數千萬人民，在中國政治上發生着決定性的作用，也都是由於這樣民衆由衷地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結果。而這種力量，完全由於毛澤東先生的政策正確這事所產生的。

## 八 第三國際的解散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底，接得了第三國際解散的消息。我當時並不怎樣感覺着意外。

原因是，第三國際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從最初起即並非密切，特別是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關係差不多已完全斷絕了。我也曾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對這問題商談過，他們也同樣對牠的解散表示贊成。解散的理由，第一、因為正和牠與日本及中國之間同樣，第三國際與世界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都已因戰爭的結果而變得非常困難，因此，第三國際對各國的情形已變得很隔膜，已無法像從前那樣行適當的援助。第二、因為各國共產黨本身業已成長得變成了大人，關於本國問題的處理，已可以不需第三國際的援助而也能由自己去解決了。第三、因為如上述那麼，第三國際在實際上已不能做什麼工作，同時也並不在活動，然而各國反動分子却還要利用着第三國際的存在而誹謗各國共產黨，並妨害了蘇聯與英美民主主義諸國之間的反法西斯國際民主戰綫的結成。這些便是第三國際解散的理由。

我在延安的報紙上發表了文字，內容說日本共產黨也贊成這個解散。這時，我已決心不再秘密我的存在，而要公然以「岡野進」的名字活動了。原因是，因為我的最初的目的即滲入日本國內這事，已差不多完全成爲不可能了。再者，也因為在華北戰場上的我們的活動，以及教育着日本人而養成民主主義革命戰士，越發變得重要了。

不久，中國事變七週年紀念日到了。我在這一天的報紙上，發表了「告日本國民」這篇檄文。在這篇文章裏，寫着這樣意思的話：這次戰爭，是爲了掠奪中國及南洋的資

源起見而被掀起的，日本軍閥及財閥的戰爭，對於日本人民，祇有被強制作巨大的犧牲而已，所以日本人民必需爲反對戰爭及打倒軍部而奮起。我把這篇文章印成了小冊子，在前綫各地把許多冊送進了日本軍隊。這事，後來會接到這樣的報告，說是對日本兵士喚起了相當反響。

## 九 毛澤東的印象

我在到延安去以前，關於毛先生是怎樣的偉人一事，即已有着大概的知識。特別在我的印象中留得深刻的，是在日本軍人所寫的文章中，曾說到毛先生是百萬人中難得一人那樣組織者。但是實際上在延安和毛先生一起工作和交往着時，我所感到的是，並非百萬人中一人而是數億人中祇有一人的那種人物。這並不祇是我的印象。一個外國記者也在前年到延安來會見了毛先生後，曾這樣對我說過：『毛澤東才真是中國第一個偉人』。他不但是馬列哲學及政治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同時也是把這些理論能正確而巧妙地應用於實際方面的第一人。

毛先生對於理論，並非僅僅作爲理論而加以把握着，却是把牠作爲實際政策的指針而運用着的。他的洞察力的卓絕，真令人吃驚，例如讀了他在一九三八年所寫的「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也可以知道，他在那時即已非常正確地洞察着日本帝國主義所要走的路

和中國所要走的路。

我特別要跟他學習的是，他對事物的看法永久是客觀的、具體的這點；無論怎樣的場合，他一點都不拘泥於理論，或公式地賣弄理論。他經常對年青人這樣教着：對於事物，不要完全主觀地去看，必須客觀地去看。

他又非常富於自我批判的精神，一經採取着樂於聽他人批判的態度。儘管有人把他惡罵或譏諷，他總不報以責罵，却要想在其中是不是有一點正確性。特別是農民的聲音，民衆的聲音，他最愛聽。在四年以前的夏天，有過這樣的事。在延安，議員們正在集會的時候，不巧在會場上打了一個雷，有一個議員死了。這時在參加的農民中，有一個間諜混在裏面，他輕輕地自言自語道：『死的如果不是議員而是毛澤東，那就好了。』有人把這消息告訴毛先生時，毛先生就問他，當這個間諜這樣說時，其他的農民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可是他竟意外地聽到了這樣回答，說：『農民們當時一聲不響』，毛先生大大地發生了感觸。在想：農民們爲什麼沒有抗議？——毛先生在責備農民之前，先反省一下自己這方面有沒有什麼不好。於是熱心地調查農民的經濟狀態，結果，毛先生發見了一點，即當時對農民的課稅比較高了一點。於是，毛先生就徹底地調查邊區全體的經濟狀態，拚命地致力於依新的經濟政策改善農民生活。其結果，他曾有一個有名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發表着。

同樣的例子還有一個。那是前年的事，在延安最高的學府「馬列學院」的學生中，有一個托派的間諜。他爲了擾亂黨的內部，並擊落毛澤東的權威起見，抓住了毛先生或邊區的生活問題，開始了種種的攻擊。有一次，他把指導者的生活比了學生的生活多少要好一點這事，作爲攻擊的題目，在壁報上也寫着。對於這個攻擊，學院中的大部分學生都表示贊成；毛先生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當然很知道這是出於托派的意識的策動，但他完全不採取加以彈壓的態度。正相反，他把這個問題作中心，在學院中叫學生們自由地熱烈地討論，這討論繼續至一個月以上。最初托派佔優勢，可是隨着討論的進行下去，全體學生都知道這托派的意見完全錯誤了。終於在全體學生的面前，被暴露了這是托派的間諜行爲。在這裏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對於這樣的托派的言論，也並不去加以高壓，却採取着依學生全體討論以使徹底明瞭其錯誤的這一方法。這樣一來，全體學生也就能够由衷地知道毛先生的思想是完全正確了。在這個事件上，再有一件我們應該學習的事是，毛先生抓住了托派所說的學生生活比較惡劣的這點，立刻爲了改善延安一般學生生活起見，而採取了新的經濟方策。毛先生的這種態度，畢竟不是普通的指導者及政治家所能做到的；不但要從同志學習，而且要從敵人學習，這是他經常所取的態度。

再者，毛先生對於幹部的養成和保存，非常注意。到今日爲止中國共產黨的所以能够做重大的工作，也正是這個政策的結果；十年前從江西省的蘇維埃地區作二萬五千里

長征而走到華北，其理由之一，也是爲了保存共產黨幹部起見。關於毛先生的如何珍視着幹部，由下面一事也可以明瞭，即爲了在上海附近及南京以及其他日軍佔領地區秘密活動着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安全起見，曾採取着所有一切的方法。當他們在前線活動了一定的期間之後，必定把他們喚回邊區，讓他休息，以保他們的安全。一方面，爲了養成幹部起見，在延安建立了各種的學校。在這些學校中，也收容着曾在前線或日軍佔領區工作的高級幹部，教給他們在前綫所學不到的理論，教畢以後再送他們上前綫，是採取這種方法的。而且，即使對過去曾犯了錯誤的幹部，也並不採取將其捨棄的態度，却去教育他們，曉諭他們，使他們自己悟徹其錯誤，把他們指導着往正確的方向走去，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例如在去年所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大會中被選出的中央委員中，也有過去曾犯重大錯誤的指導者在內。像在一九二九年那時犯了極左的錯誤的李立三那樣，也因爲他以後的態度已改善，所以把他也選爲中央委員了。像這樣的例子，此外還有好幾個人。

毛先生的再一點特色，便是非常謙讓。即使對於農民，也立在與他們相同的地位上說話，而且對無論誰都一樣非常親切的。即使對於我這樣的人的個人生活，也一直表示非常關心，我在患着慢性關節痛時，他曾送給我從日軍佔領區買了危險取得的藥品；如果農民送來了黃河鯉魚，則特地叫人送來給我。



我在離開延安之前，曾和毛先生關於戰後的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交談了一晚。當時毛先生對日本民族與中國民族的長期間的歷史的、傳統的關係加以分析，對日本帝國主義在過去的企圖把中國奴隸化的陰謀表示深深的憤慨，可是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必定會在這次戰爭中滅亡，日本一定會成爲新的民主的日本。而且實際上，日本的狀態也的確變成了毛先生所預斷的那樣。毛先生對民主的日本具有極大的希望與期待，並且重複地說，中國共產黨必定給與盡可能的援助。他認爲要實現民主的日本，對於在戰後日本也將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有徹底清除的必要，他對於當時成立的東久邇宮內閣也會非常憤慨，認爲這不過是戰爭期內軍閥內閣的延長，所以將來如果在日本仍有這樣的內閣繼續存在，一定會妨碍日本的民主主義化，而且這樣的日本，要和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是不可能的。他這樣主張着：『將來在日本民主化了的時候，中國和日本的確會使經濟的關係結得非常密切的。中國在現在，雖在工業方面和技術方面很落後，但將來則無論如何要將牠工業化的。到那時，日本的工業和技術，對中國是絕對必要的。關於這些，務必希望日本加以援助。如果這樣，日本所必需的種種原料，也可以由中國供給了。這樣，過去日本軍部所說的「中日共存共榮」才可以真正實現。要達到這事，有一個條件，那就是無論如何必須建立徹底的民主的日本。』所以對於現在這樣的幣原內閣，中國人民決不和他作對手，而且即使在參加這內閣的政黨，以及在戰時會明裏暗裏支持着戰爭與

軍部的政治家，結成內閣的時候，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和牠作對手的。我和毛先生分別時，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激勵我爲建設新日本而竭盡全力，相約着在這個事業完成的一天再見，而分別了的。

## 一〇 朱德的印象

朱德先生當我到延安去時，他還在最前線指揮着八路軍，可是在四年前，他回到延安來了。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所得的印象，是穿着極普通的農民們穿的軍服的一個人；身體雖然魁梧，可是其軍服却和士兵沒有多大差別，在夏天則一直穿着洗晒得很舊的軍服。他極少說話，在他從頭到腳都看不出他是一個能和日軍作對手的，勇敢而巧妙地指揮作戰的偉大的戰術家，和勇猛的軍人那樣的風格。朱德先生的出身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閥，可是在那個期間，他自己却痛切地感到了軍閥是何等罪孽深重的一種人。他在雲南帶着軍隊的時候，即已參加中國獨立解放運動，其後，完全擺脫了軍閥生活，到德國去留學了。從這時起，他開始對共產主義共鳴，不久即加入了共產黨。他雖是全世界有名，但決不趾高氣揚，常常和士兵一起玩排球之類。但因為他球藝拙劣，他加入那一組就那一組敗，所以士兵不大歡迎他加入自己一組。再者，他又和士兵一起，拚命去耕作。他研究着別的農民所不種的蔬菜的種植法，用美國的種籽種着生菜那樣的東西和極

好的豆子等。看了他這種時候的姿態，就覺得和那些地方年老的農民完全沒有一點兩樣，但是一談到政治和軍事時，就可以知道他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他不但在戰術上傑出，而且在判斷力和決斷力上也傑出。朱德先生正和毛先生一樣，對人非常親切，一向採取着從他人學習的態度。所以我到他家裏去時，每次總是拖住了我，熱心地討論日本或世界的情勢。他對於居住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鮮人、南洋人等，也一徑具有深切的關心，對這些民族的解放運動給與着積極的援助。他有時也忙裏抽閒，跑到勞農學校來對學生講話。

## 一一 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了。這次大會，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像這次大會那麼準備得週到，大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看到吧。作為大會的準備而化的時間，差不多達二年以上。代表們，除了八路軍與新四軍所支配的廣東地區之外，從上海、重慶、北平、滿洲也跑來參加。他們到了延安後，大多數住在黨的學校內，作為開會的準備，而徹底地討論着大會的中心問題即黨的基本方針。他們從過去的黨的政策批判，開始做起。爲了這種討論，大約會化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吧。但是由於這個討論，不但黨在過去所犯的錯誤已明白，而且毛澤東政策的正確也變成萬人公認了。這樣的長時間的討論告終以後，開始舉行大會了。關於這次大會，我雖不能有很多可說，不過我可以說，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朱德的軍事報告，劉少奇的組織問題，是大會的中心議題。毛澤東的報告，題名爲「聯合政府論」，論述着新民主主義中國應走的路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

我在這次大會中，曾發表了題名「民主主義日本的建設」這篇演說。其內容是，分析着當時日本國內的情勢，論述着日本軍部的敗北已迫近，在敗北後，民主主義勢力將急速抬頭，而且共產黨必須爲這事而傾其全力，同時我又論述了民主主義日本應取的政

治及經濟的途徑。當我把這篇演說以『中國、日本人民團結萬歲』這一句來結束時，全體代表熱狂地報以掌聲。

在這次大會中，毛澤東的政策被全面採用，他的權威成爲屹立不動，百萬黨員以他爲中心而堅強地團結了。

## 四 走向國難的祖國

### 一 太平洋戰爭與反戰鬭爭

從一九四〇年的歲尾那時起，在延安起了激烈的論爭，那是關於下面的這個問題的論爭，即日本帝國主義者將北進向蘇聯挑戰？還是奪南洋而向英美挑戰？當時的情勢的確有這二種可能性。我自己，雖認為當時的東條內閣將先實行南進，關於這點，我也寫過論文；可是在延安，還是北進論者居多。但是到了翌年春季，日軍在越南南部登陸，進迫泰國的時候，則大體的情勢已明瞭起來了。十二月八日日軍襲擊夏威夷的消息，在延安，我是最先在收音機中聽到的。後來，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延安，延安陷入了一種興奮的狀態。這時，我在延安的報紙「解放日報」上寫了社論，暴露了這個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性質，同時，又作了這樣的主張，即日本在起先的期間，大概會獲得一時的勝利，可是不久即會開始戰敗，最後則必定會以日本的完全敗北而告終；但這是日本軍部的敗北，以這事為機會，日本的人民一定會獲得自由，所獲得建立民主主義日本的機會。這個主張，毛先生等也表示同意，延安的人們也認為這次太平洋戰爭必定會促進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

這個戰爭發展下去，日軍在瓜島敗北了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已到了頂峯，往後即將漸次走入沒落的方向。同時，又因為即使在日軍內部也對戰爭前途懷疑起來了，所以我們越發加強了對日本軍隊的宣傳活動。結果，獲得了較過去更大的效果。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延安舉行反戰同盟大會，在這次大會中，把反戰同盟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同時，也決定以這個團體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鬪爭的一翼而活動了。在其綱領中，包括着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制度的確立，以及日本的經濟建設等。我想了日本的報紙雜誌以及收音機等，知道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惡化，自由受到極度制限，反戰的人們大多都逮捕入獄。再者，由前線來的日本兵士那裏，知道了不但國內的情形，即使日本軍隊的生活也已變得很壞，兵士的心情也急速地變化了。

我始終和解放聯盟的幹部舉行集會，關於日本將來的問題，進行着種種計劃，同時，關於回到日本去以後的活動的準備，也作了協議。即使在學校中，也加緊進行幹部的養成，務期他們在日本敗北後立即回去能够工作。知道了塞班島被美軍所奪，菲律賓已陷落，由於B二十九型的本土轟炸而許多都市化為灰燼，許多兄弟姊妹慘死等事的時候，我真覺得五內如焚。同時，我對掀起這個戰爭而招致這種敗北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益發加增了憎恨。到了日軍終於要完全垮台的前夕，日軍就像溺水者想抓住稻草一般，開始了所有一切的策動。去年年初，在北平附近的前綫，曾以我的一個朋友的名義，通

知我要求會面。我沒有去理睬。可是到了六月裏，有兩個人又跑來向我要求會面了。目的，據說是希望和我會面以後，爲日軍講求打開局面的方策。我對這種軍部的要求並不回答，却立即在前纔把這兩人逮捕了。不久，又有岡村寧次大將從南方開始同樣的策動了。我回到日本來後才知道，他們曾預備驅使我的舊友和親屬，而要進行同樣的事。日本的軍部爲了拖延自己的沒落起見，甚至對於一徑目爲眼中釘的我，也竟出以哀求的態度，真可說厚顏無恥。等到日本終於敗北，我準備回日本去時，蒙疆軍對南京發了這樣的密電，指示着說，野坂一定要回日本去的，但決不能讓他回去。日軍的密電，我們大抵都解得的。我知道了在蘇聯參戰後第二天，日本即要求投降了。

於是，我立刻在報紙上發表文字，提倡民主戰綫的結成，同時又以短波發送給各方面。其內容，與我在一月裏在日比谷公園的歡迎大會中演說的要旨相同的。我認爲要打開日本的危機，建設新的民主日本，則結集我國所有一切民主勢力，是最好的辦法。

## 二 亡命告終

我立刻開始作回日本去的準備了。但是這個旅行，有着極多的困難。第一，即使要從延安到北平，也除了徒步行二個月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而且即使到了北平，也沒有能回日本的把握。然而不如此，要從上海方面走，却也沒有回去的路。我曾對美國要求，



靠美軍的援助把我送回日本，可是沒有回答。我有點急起來了。可是到了九月初，我聽到了有美國飛機從延安起飛，把美國兵運到張家口南一百六十公里的靈邱這個村子，如果讓這個機會逃去了，就完全不能預知究竟幾時才能走近日本。於是一方面向美軍請求搭乘，一方面，對華北及華中的日本人解放聯盟盟員，也發出了向日本方面移動的命令。美國飛機在九月十日的中午從延安出發了，可是這時，除了我之外，還容許了三個解放聯盟盟員和十五個八路軍幹部搭乘。這樣，我們就能在當天下午到了靈邱。從那裏有時步行，有時乘馬，有時乘小車，有時乘火車，好容易抵達了張家口。這樣竟化費了一個星期左右。我開始和原來在張家口的日本人一起工作了恰巧一星期，突然有蘇聯飛機飛抵了張家口的飛機場。這架飛機是為搜尋失蹤了的蘇聯飛機，飛到了北平，可是因為不知下落，又飛到張家口，預備從這裏再回到長春去。八路軍的幹部就和那個飛機師交涉，請其把他們和我們一共四個人帶到滿洲去。起先好像很困難，結果還是答應了。我們和八路軍幹部，搭乘了這架飛機而能飛到滿洲了。

當我還在滿洲的時候，已由收音機及電話而得知了日本共產黨業已合法化，並且德田、志賀、春日、袴田、宮本、以及其他指導者，已從獄中被釋出了。我得知了這個消息，不禁雀躍欣喜。這些指導者和我，是長期間以同志愛而強固地結合着的。但是我會想，他們由於十數年的長期間的獄中生活，大概身體已壞得不得了吧？可是使我吃驚的

是，他們從被釋放的那天起即開始活動了。對於這點，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是吃了一驚的。他們說，即使在全世界的革命運動史上，像這樣的事大概也沒有吧？我對於日本的勤勞階級有着這樣的英雄一事，感得是極大的矜誇。我在心裏想，務必早一天回到日本，把他們的重負少許分擔掉一點。

但是我的旅行，因着種種的障礙，而極費手脚，可是不管怎樣，總之是一天比一天走近了日本。經過瀋陽、平壤而抵漢城，在一月十日才在我片刻不曾忘懷的祖國日本的土地上，踏上了登陸的第一步。這是隔了十六年才又踏上祖國的土地。

當我抵達博多船埠時，在那裏所見的同胞的姿態，是被難看的破衣所裹，孩子們的臉也消瘦着。一脚跨進博多的市街，則在那裏有被破壞了的街和黑市場。這就是我連做夢也不能忘記的祖國的姿態嗎？當我這樣想時，就發生了悲壯的感情，同時，又對於把日本導入這樣命運的日本支配階級，加強了新的憎恨和向他們鬭爭的決心。我在往東京途中，看到了許多都會遭了破壞，而且這狀態，比了我所預想的要深刻得多。我想到，要重建新的日本，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必須斷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且要達到這點，共產黨必須真正地拿出力量來。這是因為我想到了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這樣在過去爲了民族或人民的幸福與解放而拚命鬭爭過的政黨，唯有靠這樣的政黨才能打開日本的危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亡命以前

一 出身

二 加入友爱会

三 在伦敦入党

四 在「市谷」迎接大震灾

五 再度入狱

六 老鼠和特务

七 逃出故国走上亡命之旅

苏联的印象

一 作为冈野进的生活

二 伟大的片山潜

三 片山潜的国葬

四 被重视的苏联儿童

五 学校种种

六 丰富的私有财产、优裕的生活

七 打扮的莫斯科姑娘

八 无贼之国苏联

九 休养所生活

一 完全的民族平等

一一 指导者的印象

(A)史达林

(B)狄米托洛夫

## 延安生活

- 一 从苏联到延安
- 二 研究祖国是第一项工作
- 三 日俘的教育
- 四 对日军的政治活动
- 五 优厚的八路军对俘虏待遇
- 六 延安这地方
- 七 边区的政治
- 八 第三国际的解散
- 九 毛泽东的印象
- 一 朱德的印象
- 一一 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 走向国难的祖国

- 一 太平洋战争与反战斗争
- 二 亡命告终

## 附录页